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 了解什么是旧社会, 什么是剥削和压迫, 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 憎恨旧社会, 从而更加热爱今天,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艰苦奋斗,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 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 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 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我的覺醒.....	1
血海深仇.....	13
含泪闖关东.....	26
兩代血泪仇.....	36
牢記階級仇.....	45
漁人泪.....	57
見了青天.....	66

附 录

惡霸地主徐万增的罪行录.....	75
漁霸蔡仁欽的罪行录.....	89

我的觉醒

黑龙江日报社 李 貴

一想起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阶级仇恨就象潮水般地涌上我的心头，革命的意志就更加坚定了。

含泪闯关东

在我很小的时候，听我爹说，我们家原来住在山东省掖县小王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家中原有二亩薄地，传到我爹这一辈，一连闹了三年水灾，这一点祖传的家业也就抵了地主的阎王债。眼看着一家人就要饿死了，我爹对我娘说：“人挪活，树挪死，咱们闯关东吧！”……于是，我爹用一条扁担两个抬筐，挑着我两个姐姐，领着我的母亲，流着眼泪，离开了祖辈居住的小王庄。

出了山海关，大地空旷，四野茫茫，哪里是穷人安身的地方呢？爹逢人就问，见人就打听，都说北大荒人少地多，日子好混。于是一家四口就拼命地往北走。一路上风吹雨打，忍饥挨饿，赶着路讨饭，讨着饭赶路，一春一秋过去

了，仍然沒有落下脚来。最后走到黑龙江省綏化县刘家鎮子屯，地主刘天成見我爹和娘都是能干活的人，就对我爹說：

“我借給你們五吊錢安家，你們就在我这儿干吧！”我爹和娘想，穷人到哪都是卖这把穷骨头，庄稼人到哪还不是种地干活呢？于是我爹和娘就留在刘家鎮子。我爹就給刘天成干起活来。

我爹这个人一干起活来象拚命似的，起五更爬半夜，就这样一直給地主干了十年，結果穷得爹和娘还是得穿一条褲子，而刘天成借給的五吊“安家錢”，却翻成了一百吊了。接着发生了更不幸的事情。那是在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爹累成了伤痲，病倒在炕上。快要过年了，家里沒有一粒米，外面下大雪，屋里飄雪花（我家住着地主刘天成的一間破更房子），眼看一家人就要冻餓而死。狠心的地主刘天成，看我家穷得这个样子，看我爹病得又不能干什么了，就在这年的大年三十，以抵一百吊錢的債为名，搶走了我的十七岁的大姐。我大姐是个剛强的人，由于她不能容忍刘家的侮辱，当天夜里，就被逼死在刘家大院。第二天，地主刘天成反咬一口，硬說我家用死閨女訛他，非要我爹用我的十五岁的二姐去換我大姐的尸体不可。这是多么慘絕人寰的事情啊！剛剛挖掉了心头肉，怎能忍心让二女儿再跳火坑呢！爹和娘强忍着滿腔憤怒和悲痛，在大年初一的晚上，不顾死去的大女儿，趁着月黑头，偷偷地逃出了刘家鎮子屯。

携女再逃生

就在这次逃亡的路上，我娘生下了我。我爹听人说，海倫县靳家沟土地肥沃，日子好混，于是，爹和娘抱着闖大运的念头直奔靳家沟。

“靳家沟，靳家沟，到了靳家人更愁，地主豪門酒肉臭，穷人餓死在街头。”真是这样啊！到了靳家沟不仅照样受苦受累，还是照样挨餓。就在到了靳家沟的那年春天，借不到吃的，我二姐就活活餓死了。这时，当地地主岳八方，打发人找我爹去給他扛活。我爹給地主干活吃怕了亏，又听屯邻說岳八方凶狠，就沒敢答应，自己便在屯东挺远的小树林子旁，开了三亩荒地。可是地板不好，加上天灾，一年打不了多少粮。

七冬八夏过去了，我身后又添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家七口人，靠着这点地打的粮怎么能填飽肚子呀！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日日啼饥日日饥呀！我九岁那一年，全家人拚死拚活的精心蒔弄，又加上风調雨順，换来一片好庄稼。秋天到了，望着那狗尾巴似的谷穗，胳膊粗的玉米棒子，从来没有乐模样的爹如今瘦臉上也挂上了一絲微笑。到了收割的日子，有一天，天剛放亮，爹娘和我三个人，拿着镰刀下地了。一路上，我兴奋地跑着跳着，时时地停下来等我那怀孕的娘。过了一道小沟，再穿过小树林，就是我家的地了。我大步流星地走到地跟前，突然，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昨天

还是一片好庄稼，怎么连一棵谷穗都不见了。这晴天的一声霹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无情地落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顿时痛哭失声。不知过了多久，只见狗腿子李大尖头斜挎着盒子枪，保护着恶霸地主岳八方向我们走来。李大尖头瞪着他那双一大一小的三角眼对我爹说：“叫你扛活你不干，偏偏偷开老爷的荒，这叫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单走独木桥哇！实对你说吧，庄稼叫东家收了，地也叫东家收了，以后老老实实给老爷扛活，不然，可别怪老爷办你偷占土地的罪！”明明是自己辛辛苦苦开的荒，凭什么现在倒成了他的了！我娘顾不上自己的重身子，扯住岳八方讲理，谁知狠心的地主一顿拳打脚踢，我娘晕倒在血泊里。爹和我，眼瞅着岳八方在狗腿子的保护下走掉了。我哭，我喊，我叫，谁来救我的娘呀！

父母遭毒害

把血人般的娘抬回家来，娘三天三夜不省人事，血不停地流着。她那本来就瘦削的脸，变成了蜡黄色，气也短了，嘴里却老是“粮啊，地啊”地叫个不停。谁都說娘不行了。在那个年月，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打掉了牙得往肚子里咽呀！爹急得整天整夜在屋里屋外转，邻居们张罗着娘的后事。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就在第四天将要黎明的时候，娘一声惨叫，“地是我们的！”之后，再也没有声音了。我的勤劳一生的娘，就这样被狠心的地主活活地踢死了。我放

声大哭，弟弟妹妹們更是哭个不停。邻居們看着我們这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想到我們以后的生活，沒有不掉眼泪的。

娘死了以后，爹无路可走，只好去給岳八方家扛活。从此，爹每天天不亮就走，三星歪了才回来，家里只丢下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守着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整日饥哭喊叫。日子可真难熬呀！邻居劝我爹把最小的孩子送給人，我爹一个劲儿地摇头，誰忍心将自己的孩子送給人哪！后来，眼看只有一生日的小弟弟和剛滿两周岁的小妹妹快要餓死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天夜里，爹终于滿眼含着热泪把我小弟弟送給西屯一家姓王的，把小妹妹送給本屯一家姓李的了。

我們一家人，就这样，生离死别，只剩下四口人了。

由于长年的饥餓、劳累和折磨，我爹的精力消耗淨了，身板更不济了。在一九三三年冬的一天，爹由于白天干活伤了力，晚間回家連吐了几口鮮血就死了。

爹死后，好心的邻居們湊錢买了一口薄棺材。临要埋时，地主岳八方傳下話来：死人不許进那三亩开荒地！无奈，只好把爹的尸体埋到乱尸崗子去。

孤儿进火坑

把爹埋进了土坑，我們哥三个又掉进了火坑。那时我十二岁，二弟十岁，三弟才八岁。我們哥三个开始給岳八方干活。白天，我去放牛，二弟放猪，三弟侍候岳八方的第三房

小老婆。晚上，我們三人挤在牛栏角上放牛犢的小破屋里，互相擁抱着借取一点温暖。

那一年，老天也和穷人作对。在秋末冬初的时节，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盖地地洒下来，北风刺透我們的破单衣，身上的肉象刀割一般疼痛。我和二弟光着脚去放牲口，脚冻得象个烂窝瓜似的，踩在冰雪地上，每走一步疼得心都直揪啊！

一天，我三弟在給岳八方的三姨太太倒便盆的时候，天冷手僵，失手打碎了便盆，洒了滿地尿水。当时三姨太太立逼我三弟用舌头把地舔淨。又臊又臭的尿水，怎能用舌头舔呢？三姨太太看我三弟不动，一頓皮鞭，直打得我三弟死去活来，遍体鳞伤。当天晚上，我們弟兄三人挤在一起，想到地主害死的爹娘，想到我們过不完的生馬生活，抱头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岳八方的大老婆（外号叫“假善人”），一手捂着念珠，一手捂着鼻子走进来。她猫哭老鼠般地說，“阿弥陀佛，这真是前世的孽債呀！”她見我們哭个不停，就傳道般地讲起来：“祖上造的孽，子孙来还，今世还不清，来世变犬馬呀！要想不遭罪，就吃斋念佛吧！不修今世修来世，慢慢地就好啦！”她叫我跟她取回点香灰，敷在我三弟的伤口上。后来我們才知道，“假善人”是用迷信手段来欺騙我們，让我們哥仨相信，一辈子給地主作牛作馬是命中注定的。可是，那时我們这三个孩子懂得什么呀！从这时起，

一天九个响头，哥三个的劳金錢化成了地主佛堂上的香灰紙箔。

仇恨和反抗

十年过去了，我們哥三个都长大成人了，搬进了更房子。一天，岳八方的几房老婆吵架，我們在窗戶外听，“假善人”鬧着說：“他們三个白給你干了这么多年，还不是我的功劳！凭什么給小狐狸精（指三姨太）打手鐲不給我打，这笔賬得算算！”

十年的欺騙，一語道破了。我們哥三个再也不想被人愚弄了，再也不想給地主卖命了。既然地主欺騙我們，咱們就在活計上找齐。那时，正是麦收时节，地主岳八方雇了一些短工，叫我領着割麦子。天不亮我領着大伙下地，到了地头，我对大伙說：“人身都是肉长的，庄稼活不分亲厚，誰干累了誰歇着，为两个大餅子犯不上卖命！”我这一說，大伙都明白了。有人說：“打头的，你說怎么干，咱大伙随着就是了。”就这样，我們小气不找大气找。岳八方种了一百来垧小麦，一个麦收就叫他多花了五六十个工的工錢。誰知这事竟被岳八方知道了，他发狠地說：“整不死李貴，活着也要扒他三层皮！”我們哥三个听到这个信连夜商量，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逃！

逃到哪里去呢？破衣烂衫，出去还不得被日本鬼子抓了“浮浪”？可留下来就只有走爹那条死路了。不，一定得逃

出去！我們哥三个抱定逃出靳家沟死了也甘心的决心，一天夜里逃走了。一下子跑到四十多里外的一个屯子里，經人介紹，給一家姓李的地主干活。誰知道沒过两天，岳八方的狗腿子李大尖头就找上門来，硬逼着我們弟兄三人又回到了靳家沟。

两度当劳工

就在我們回到靳家沟的第二天，半夜里一陣狗咬，来了两个背枪的自卫团丁，速捆帶綁地把我送到伪县政府动员股。接着，又把我和另一些被抓来的穷人，一批批地塞进“悶罐車”运到了孙吳县。从此，我又开始了地獄般的劳工生活。

当时我被分配到离孙吳县四十多里的楊木山上。楊木山是一座荒山，山上长滿了刺人的荆棘，山下是一片碱水塘，塘里长着沒膝高的羊草。我們这些被抓去的劳工，是給日本鬼子打羊草的。日本鬼子的馬吃得膘肥毛亮，可是打羊草的劳工，一頓三两橡子面，吃下去拉不出来，整天肚子疼。每天天不亮下塘打草，两条腿被碱水泡的肿得象琉璃灯，瞎虻和蚊子，咬得我們渾身連包帶血。生了病就更糟了，不少人带着气就被扔进万人坑。生活在这暗无天日的活地獄里，誰不想逃出一条活命啊！劳工們天天想逃命，可是日本鬼子看守得很严。劳工中实行什么“五人联坐法”，一人逃走四人遭殃。这样还怕人逃跑，晚上睡觉衣服脫在一起放在外边，人

赤身裸体钻进人字架工棚子里，两头还設上崗。

有一天，二鬼子中队长調我去給他燒飯。那小子吃大米嫌酸，专吃高粱米搓出的白仁。高粱米是我用磚头在小河里給他搓的，他吃出来一顆砂粒，硌了他的牙，他便給我扣上个“居心不良，謀害长官”的罪名，一頓馬棒把我打得昏迷过去，随后又把我扔进万人坑。多亏在一块干活的董富和孙万山，他們看我还有口气，又偷偷把我背回来。就这样，我才从九死一生中熬过一期劳工，拖着虛弱的身子，回到了海倫县靳家沟。在那年，我和雇农的女儿刘素琴結了婚。

岳八方当初抓我劳工，滿打算把我治死在外边，他好更牢靠地奴役我两个弟弟。沒曾想我不但活着回来了，又娶了亲，他就在我結婚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又对我下了毒手，我第二次被抓了劳工，发到黑河挖山洞。事后才知道，这是日本鬼子一个秘密軍事工程，誰到那里去当劳工，就不用想活着回来。我在那里当劳工时，只見到一批批的劳工被绳子系着押进山洞来，却沒有見到一个人被放出去。要不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垮了台，我做梦也回不到家乡了。

換湯不換藥

盼星星，盼月亮，可下子盼到祖国光复，我以为这回穷人可能得好了。可是当我从劳工棚子逃回到家乡时，我的心又凉了。日本鬼子虽然跑了，可又来了国民党的維持会，換湯不換藥，天下还是地主老財的。岳八方昨天是日本鬼子的

帮凶，今天摇身一变倒成了“抗日”的国民党了。这时，我的那个穷家呀，可比早先更穷更苦了。因为我被抓劳工一去两年音信皆无，老婆急瞎了两只眼，一条腿生疮，烂得下不了炕。两个弟弟被岳八方折磨得不象人样了。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岳八方打发人把我找了去。我去时，岳八方正和他三姨太太躺在炕上抽大烟，见我来了，马上翻身坐起来，满脸堆笑招呼我坐下。谁知道他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不由得警惕起来。岳八方干嘿嘿了一阵之后说：“咱们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穷富之分，你是大贫，我哪，是小贫，嘿嘿！既然都是穷人嘛，事就好办。”

“简直是放狗屁！”我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

“你们弟兄三个在我这呆了这么多年，虽说没发财吧，可总算把你们拉扯大了。”岳八方讨好似的又说：“明年我租给你们地种吧！没牲口就用我的，没种子也用我的，至于租子嘛——好说！”

原来，岳八方还想从我们哥三个身上打鬼算盘哪，真是瞎了他一双狗眼！我一句话没说，抬腿就走。我已经走出了房门，岳八方还在后面叫我哩。

可是，穷人总得找条活路呀！就在这年冬天，我和外号叫“李花牛”的地主李景田讲定，租种十五垧地，三头老牛外借种子，秋后按倒四六开交租子。第二年开春，我们弟兄三个，不分昼夜，精心莳弄，又加上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到秋天得了个好收成，去了还地主的十分之六的租子

和种了，余下的粮食还足够一家四口人填饱肚子的。誰知就在快要打完場的时候，三头牛被人偷走了。我們哥三个急得一夜沒睡觉，四处寻找，哪有个踪影！第二天一早，地主李景田就来了，張口就要牛，沒牛就包錢。結果把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拉走了，还倒欠地主五十元的伪币。

后来才听說，借牛，偷牛，要牛，包牛，全是地主李景田早就一手制造好的阴謀詭計。我一气之下，拎起一把菜刀就要找李景田拚命去！我老婆拦挡我，弟弟也拖住我的大腿，哭着說：“哥哥！人家李景田和岳八方是亲戚，有财有势，有枪有炮，你这不是白送死去嗎！”我仰望着蒼天，气愤填膺，明明是地主蓄意陷害人，可是，在那有理也沒处講的吃人的旧社会，哪有穷人的活路啊！

解 放 获 新 生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晴天一个响雷，共产党、毛主席派来了土改工作队。一場砍大树、挖穷根、斗地主、打土豪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鬧起来了。

多年来我日夜盼望着的，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我和二弟馬上参加了农会，整天忙着筹备砍挖斗争的事。当时的海倫县长到我們村子了解土改情况，听說我老婆病得很重，写一封介紹信将我老婆送到县荣軍医院。眼看就要烂死的人了，經過截肢，保住了生命，多年失明的两眼，又重见天日了。

一九四八年，二弟李財和我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三弟李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二弟和我被調到区上，弟弟当区长，我当了区委宣傳委員。过去一个大字不識，怎能搞好工作呢，我下定决心要掌握文化这个武器，我买了紙笔，每天练习写字。慢慢入門了，我就练习給报社写稿，把学习文化、写稿和工作結合起来。一九五〇年冬天，党調我到黑龙江日报社工作。象我这样一个大老粗却到党报做新聞工作了，这在旧社会里是絕對做不到的。我的二弟李財，現在是江西省彭澤县县委书记。从小就被爹送了人的、失散了十几年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在党的帮助下找到了。我們李家七輩子沒有一个識字的，如今，我的孩子有的上了中学，有的上了小学。所有这些，在旧社会，一个世代代受人奴役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啊！撫今追昔，忆苦思甜，党是我再生的母亲啊！

血海深仇

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人民公社 赵有康 口述
新城堡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

中共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委宣传部 整理

我叫赵有康，今年四十岁，在旧社会整整过了二十三个年头。二十三年里，旧社会，旧制度，地主老财害得我家破人亡，骨肉分离。下面就来讲讲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

我原籍是河北省蠡县道北庄人，祖祖辈辈给地主扛活。在我两岁那年的春天，我们家乡闹了水灾，把地都淹了，我爹被地主辞退，家里穷得没法过了。为了活命，爹爹一头挑着我哥哥，一头挑着我，娘跟在后边，一家四口人，逃荒到关东来了。

在路上，整整一年多，走了一千多里，我们来到了辽宁省新民县蛇山子。一个姓郑的地主看我爹体格壮，又会种菜。是个好劳动力，就说：“你别走了，给我种菜吧！”

我们本来没个准去处，我爹和娘一核计，也就留下了。

当时，姓郑的地主一年才给我爹十八块钱工钱，这怎能养活我们一家人哪！所以一家还是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穷日子。我七岁时，就跟着娘和哥哥给地主打短工在菜园拔草。尽管这样，可还是糊不住口，只好挖野菜、搯树叶吃。我们到蛇山子的第九个年头上，娘先后又添了我三个妹妹，生活就更困难了。姓郑的地主假心假意地对我爹说：“生活困难，孩子也跟着受罪，我给你大女儿找个人家吧！”

这年，我大妹妹才六岁，还不大懂事，我爹不同意。姓郑的地主又说：“给一石粮，你们先吃着，孩子嘛，先不领，大了再去。”

说话后不两天，他的亲家小河套地主刘宝福真的送来了一石粮，把我妹妹许配给了在他家扛活的外甥。

在旧社会里，给地主扛活，说要就要，说不要，随时都可能被辞退。就在我大妹妹许配给刘宝福外甥的第二年，刚过五月节，姓郑的地主看我爹年纪大了，要赶我们走。我爹急了，忙说：“我这一家老小，已经给你干了十年了，现在要我到哪里去呢？”

没等我爹说完，姓郑的地主就翻了脸说：“少废话，不走也得走，我要拆窝棚。”

我爹硬是不走，地主一看硬的不行，就耍了个花招，来了个软的，给我们写了封信，说：“赵老头哇，我这实在不能再用人了，你去投奔滨旗县后新秋（现在划归法库县）我亲戚老康家去吧！”

实在没办法，我們只好离开老郑家。正当我們收拾东西，全家准备要走的时候，姓郑的地主又来了，他对我爹說：“要走了？可别忘了把你大女儿留下！”

大妹妹听說要把她留下，哭着往娘身边钻：“娘，我跟你走！”

“孩子，走，我們一起走。”娘說着，双手紧紧地搂着妹妹，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爹。我爹气得面孔刷白，冲着姓郑的地主說：“当初你讲的明白，不是大了再領嗎？”

地主脖子一歪，說：“大了？你們这一走，我上哪找你們去。”并威胁我爹：“你已經吃了人家一石粮，不然，就連本带利还給人家！”

我爹說：“等孩子大了我送来，現在留下，我不干。”

那时候，印把子掌握在地主老財手里，他們有官府衙門、警察、狗腿子。姓郑的地主被我爹駁得沒話可說，就到街上警察署把我爹告了，警察把我爹傳去关了起来。我娘哭着跑到警察署，說：“先生，我們不是不給孩子，……”

“給？你們为什么还要把孩子带走！”警察打断了我娘的話，气势汹汹地說。

我娘申辯說：“現在孩子还小，当初也讲好，大了再去的呀！……”

“胡說，还想要賴。留不留下？不留下，把你也关起来。”

沒有办法，我爹和娘只好含着眼泪把我大妹妹給留下

了。

十年，整整十年！我爹起早貪黑，風里來雨里去，在地主的菜園里累彎了筋骨，頭髮也白了，結果却被地主一脚踢出了門外，還害得我們骨肉分離！

二

兩個月後，我們來到了濱旗縣後新秋，找到了姓康的地主，我爹進屋把姓鄭的地主寫的信交給了他。這個老奸巨滑的地主看完信，就出屋來到門口，一看我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堆人，又看我爹年歲大、身體弱，沒多大油水可榨，就說：“我不認識姓鄭的！”說着，把信也撕了。

姓康的地主不收我們，爹只好領着我們到處流浪討要。我娘經常淌眼抹淚地叨咕我大妹妹，我爹看娘天天掉淚，自己也很傷心。一天，我爹把我們安置在一個瓜窩棚里住下，他自己回新民去看我大妹妹。就在我爹離開的不兩天，我大哥出去要飯，一走就沒有回來。

六七天後，我爹垂頭喪氣地回來了，一問，才知道爹不但沒看着我大妹妹，還險些把命喪在地主劉寶福的手里。

原來，我爹離開我們後，第三天下晌就到了小河套，正碰上騎馬看地的地主劉寶福。他氣勢汹汹地用馬鞭指着我爹問：“你干什么來了？”

我爹說：“看閨女，……”

他冷笑一聲，說：“看閨女？明明是偷你女兒來了！”

說着，劈頭蓋臉就是一頓馬鞭子，直打得我爹渾身青一塊、紅一塊，鮮血直流。最后，把我爹擡了回來。

爹回來后，我們一家又到處流浪，到快割地時候，我們來到了劉邦屯，住在看梨園子的地窖子里。不久，梨園的地主知道了，不讓我們住，我爹和娘說了許多好話，並答應給他看好梨園子，這才讓我們住下。當時，爹被地主劉寶福打的傷還沒全好，又加上年歲大了，出門困難，就留在家里看兩個妹妹，娘領着我出去要飯，要着點東西大伙就吃點，要不着就得餓着肚子。爹一看實在沒辦法，就對我說：“不是爹狠心，你也走吧，自個出去要着吃吧！”

這年，我才十三歲，雖然要過飯，可從來沒離開過娘，一個人出去，不知怎麼討要，又害怕狗咬、地主罵，不願意走。爹又說：“你走吧，走一個活一個，走兩個活一雙，不然，拖在一起都得餓死！”

說着，就嗚嗚地哭了。娘看我一人出去孤單，就讓六歲的二妹妹和我作伴。臨走時，娘再三囑咐我：“要點吃的，晚上就回來！”

但是，我們一連走了幾個村莊，都沒有敢進村登門要飯。越走離家越遠，走來走去連方向也分不清了。這樣，我們出去了好幾個月，走了許多地方，飢一頓，飽一頓，白天要着吃，晚間就睡在露天的草垛里。後來，妹妹哭着要回家，我也想爹和娘，於是，就一邊要着吃，一邊打聽着回家的路回家了。娘看見我們突然回家，高興得叫了起來：“孩

子，你們可回来了！”說着，跑过来，把我和妹妹一把攆到怀里，从头上摸到脚上，把我們兄妹俩全身摸了个遍。她一边摸，一边流着眼泪：“孩子，你們受苦了！”

我看看娘，娘比以前更瘦了，更老了。但没有看見爹，我就問娘：“我爹呢？”

我这一問，娘放声大哭：“你爹……他死了！”

我一听，象被当头潑了瓢凉水，鼻子一酸，哭开了，妹妹也哭，全家人哭成了一团。后来，娘告訴我：在我們走出去的下晌，爹又不放心我們，就叫娘出去找，一直到过半夜也沒找到，爹后悔的直哭，第二天一早，又叫娘出来找，一連找了几天，都沒找着我們，爹又是后悔、又是气，又想念我大哥和我大妹妹，忧虑成病，加上飢餓，不久就死了。临死时，他还叫着我和我二妹妹的名字呢！家里穷得吃不上、穿不上，又哪来錢給爹买棺材啊！沒有办法，用秫秸裹着，由附近几个穷哥們帮着抬到后山上埋了。娘領我們去看爹的坟，誰知因为埋的不严，爹的尸体被野狗扒了，只剩下一个秫秸筒！

三

我爹一死，我們就失去了主心骨，娘領着我們兄妹三个过日子，生活就更困难了。后来，娘把二妹妹給了地主的羊信李福作了童养媳。李福娘是个热心腸人，看我們一家人苦得这个样子，就把我們接到她家去住了。不久，由李福姐夫

管連友作保，把我介紹到地主楊老五家去放羊。當時，我很高興，心想放羊一定要比要飯好。哪知道，說的是放羊，其實什麼都得干，每天放羊回來，扒灰、抱柴、燒火、担水，里里外外的零活，支使得我腳不沾地，就是他家孩子拉屎，也要叫我給揩屁股，稍一遲慢，不是打，就是罵。儘管我這樣地干，地主只給吃他們吃剩了的殘湯冷飯。睡覺也沒個好地方，住在羊圈旁的小草房里，沒鋪沒蓋，蜷縮在羊草里，常常在半夜里被凍醒過來。每天盼到做飯的時候，蹲在灶門臉前烤火取暖，這才算熬過了一個夜晚。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個來月，我沒敢歇一回工，沒有請一回假。一天早晨，二妹妹哭着來找我，她一見我就說：“哥，你回家吧，娘死了！”

我一聽娘死了，哭着跑去向楊老五告假：“我娘死了，得回家一趟！”

楊老五面孔一豎說：“你娘死了就死了唄，羊不放行嗎？”

我急了：“我娘都死了，還不讓我回去看看！”

我這一說，地主火了，一手把我拉了過去，啪，啪！就是兩個嘴巴，還踢了我兩腳：“滾，快給我放羊去！”

娘死后和爹一樣，也沒有棺材。幸亏管連友幫忙，瞞着地主，給找來了幾個扛活的，急忙用秫秸帘子裹着，抬到山上埋在雪里就走了。我想，不能再讓娘的屍體被野狗扒了，把羊趕到山上后，就找給另一個地主放羊的董洪程看着，自



己跑到村里借了鍬鎬來挖土埋娘。我人小，地凍，刨不動。董洪程比我大兩歲，我倆經常在一起放羊，他也幫我刨，我們倆足足刨了一天，才算把我娘埋上。

埋完了娘，我趕忙回去找羊，哪想到有三只母羊掉進冰窟窿里淹死了。我害怕得遲遲不敢回去，眼看日落西山了，董洪程再三安慰我：“回去吧，我幫你說說。”

剛進院，楊老五就氣勢汹汹地問道：“怎么這晚才回來，到哪儿去了？”

沒等我回答，董洪程就搶着說：“老楊大叔，別罵他了，你的三只母羊淹死了，快套車到河沿上去拉吧！”

“怎么死的？”楊老五說着，就象瘋狗一樣，呲着牙向我逼來。我一看不說也不行了，就說：“我埋娘去了！”

“他媽的，叫你放羊你不放，你去埋娘，我叫你埋娘！……”楊老五咬牙切齒，一邊罵，一邊就是一陣拳打腳踢，打得我渾身是傷。末了，還逼着我連夜把保人管連友找來，和我算了一筆賬：三只母羊，一年可以下三只羔，共是六只羊。一只羊八斗糧，六只羊，六八四石八斗糧。管連友再三說情，才算了兩石四斗糧，叫我馬上賠償。我哪來這些錢哪！給他放羊，一年才掙一石二斗糧，我銼骨頭渣子當藥賣，也還不起這筆賬啊！我急得坐在草房里直門哭。最後，董洪程給我出了個主意：“你逃跑吧！”

我想來想去，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就在當天晚上，我背着老妹妹逃跑了。我邊走邊哭，夜黑天，深一脚淺一脚，也不辨方向，走了一宿。天剛蒙蒙亮，怕地主來攔，就在草甸子里找個草垛掘個洞躲起來，晚上出來再走。這樣，整整一個白天兩個晚上沒吃着一點東西，餓得我頭昏眼花，兩腿酥軟，走不動道了，可妹妹爬在我背上還直門哭。當時，我真想狠狠地打她一頓，就從背上放了下來，可是，當我看到她那凍得發青了的嘴唇，餓得快睜不開的眼睛的時候，我的手軟了下來。這不是她自己願意跟我走，也不是她自己願意餓、願意哭，這都是叫地主給逼的啊！我緊緊地把她摟到自己的懷里，放聲大哭開了。第二天早晨，看看走得離楊家窩棚遠了，我們才敢進村要飯吃。約莫走了十幾天，我們來到

了通辽北蒙古族地区，我妹妹連冻带餓病了。到了烏巴海，剛到牧主的圍子边，看圍子的硬說我妹妹是瘟病，不让进村。沙漠地里，到处是一片黃沙，我們走了两天沒見着村，沒吃着一点东西，沒有喝着一口水，晚間就睡在沙坨子上。这时，妹妹病重得不会吱声了，我也冻僵了手脚，餓得抬不起头，一下倒在地上了。幸好，后来被烏陶海一个打柴的王老大爷看見了，把我們背到他家，这才活了命。

王老大爷也是个穷苦人，王大娘对我兄妹俩十分体貼，她給我們做稀粥吃、补衣服，特別还給我妹妹用碎皮子拼凑着做了条皮面褲子，我們在王大爷家住了十三天，妹妹的病全好了。这天，王大爷对我說：“孩子，这边是蒙古族地方，都是放馬的，你在这沒啥干的，又不懂話。留你們吧，我也留不起，你們走吧！”

王大爷家确实是够苦了，大儿子在外給人家放馬，經常不回家，也不見拿錢回来。王大爷和王大娘一天两頓，每頓只抓一把炒米，喝点开水，就算吃飯了，我們怎么能拖累他們呢。我很感激地說：“大爷，你救了我們的命，我們已經感恩不尽了！”

王大娘也再三囑咐我說：“路上要多加小心，要把妹妹带好了。”

临走时，王大娘还給我們带上了两碗炒米，把我們送到路口，王大爷又囑咐我說：“这边是蒙古族地方，話不懂，天又冷不好混，你們往南走！”

天下穷人心连心，阶级兄弟才是亲。这话不假，要没有王大爷，我们兄妹俩早就死在沙坨上了！

四

第二年镪地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法库东的刘家大沟。村上有个富农叫鲍德先，正用人，他看我个头不小（当时我十五岁），留我给他当半拉子，答应供我们吃的。谁知刚镪完地，他就对我说：“你干的倒不错，可就是你妹妹看我家孩子吃啥要啥，把她送人吧。要不，你就领着她走！”

我自从杨老五家被逼逃出来后，一年多来，东奔西走，自己受苦，妹妹也遭罪，险些死在沙坨子上，再走，到哪是个头呢？……想来想去，万般无奈，只好答应把妹妹给了柏家沟一家姓朱的做了童养媳。

就在我老妹妹送走的第二年春天，我到柏家沟给地主张祥扛活。一到柏家沟，我就去看妹妹，谁知她就在前几天已经被折磨死了。当时她只有六岁。邻居告诉我：我妹妹到朱家以后，就把她当成大人使唤，烧火、做饭，啥活都叫她去干，三九天，还叫我妹妹去井台打水。六岁的孩子，比水桶高不多，提不动水桶，就用小洋铁盒一下一下打水，身上不饱暖。冻得手脚都肿了，起了一身水泡，开春来，毒火归心，我那可怜的妹妹就死了。

张祥这个地主，可不象杨老五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他常常这样对我说：“小伙子，好好干，挣的钱，我给你存

着，比你鎖在铁柜里都保靠。过几年給你娶个媳妇。”

当时，我信以为真，就拚死拚活的給他干活，挣的工錢就存在他手里。有一年夏天，我的衣服破得筋筋拉拉的，实在沒法穿了。日头一晒，背上起了泡、暴了皮，痛得难熬，心想做件小褂穿，就向地主要錢。他象很关心似地說：“我家有布，給你做件現成的穿吧！”

不几天，地主真的給我做了一件小褂。

說起穿的，真是苦透了，我从出娘胎，长到十八、九岁了，还没穿过一件完整的新衣服。当时，我真高兴，心想，这地主真不坏，对我这样体贴、关心。哪知道，这都是地主欺压、剝削我的一种手段，黄鼠狼給鸡拜年，他没安好心。就这件小褂，他扣了我几斗粮的工錢。而这件小褂又咋样呢？下地时，我把它脫下来，折迭好放在地头，收工时再穿上，尽管这样精心穿着，不到两个月就坏了。我心里納悶，为啥一件新衣服只穿这些天就坏了呢？旁人告訴我：这是地主用放了十多年的糟布做的，哪能不坏的快呢！可地主却幸灾乐禍的說：“看你这个穷命，連穿件新衣裳的命都沒有，两个来月就把它穿个稀烂！”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垮台了。秋后打完場，地主張祥对我說：“赵有庫，冬天我这沒活干，我給你介紹去沈阳打油吧，也好多挣几个錢，春天干活时，我再去叫你！”

可是，我这一走，他就音訊全无，到老也沒来叫我再回去。后来才知道，这个笑里藏刀、老奸巨滑的老狐狸，他知

道八路軍来了对他沒好处，怕我揭他的家底，有意把我支走了。当时，我整整給他扛了四年活。离开时，存在他手里的十来石粮的工錢一个也沒給我。

我到沈阳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进城了。我在油厂里又受着資本家的种种剝削和压迫。

当时，我天天盼，夜夜想，盼望我能有个出头日。

我盼呀，盼呀！这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軍又回到了沈阳，沈阳解放了。从此，我这个旧社会的“穷光蛋”、“流浪儿”真正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不久我就成了家，有了孩子。一九五五年，我从城市回到了农村，在沈阳北新城堡落了戶。后来，失散十多年的哥哥和我二妹妹，也都来到了这里，一起入了社，我和全体社員一样，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不仅有吃有穿，还有两間房子。現在我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学，大女儿已經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紅領巾。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貧下中农社員还推选我当了貧下中农协会的副主席。想想过去，比比現在，要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們哪能有今天！我一定永远記住旧社会的苦和恨，永远听党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貧下中农一道，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含泪闯关东

吉林省撫松县东崗人民公社社員 王宗昌 口述

中共吉林省撫松县委四史編写小組 整理

我家住在撫松县东崗人民公社。可是，我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我家经历了三十多年流离失所的生活，最后才在这里定居下来。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莒县稻邱村。听娘說，我家祖輩沒有一壠地，父亲长年起早貪黑給地主扛活种地，掙来的粮食总也不够养家糊口。因此，年年都要向地主抬粮借債。有一年春天，莒县发生了很大的旱灾，夏天又遭一場涝灾，秋天顆粒无收。因为我家年年欠粮欠債，地主老財們誰也不肯再借給点粮食，我父亲只好到处打短工，我娘領着我的两个姐姐四处要飯。我的奶奶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死了。当时，我父亲連口棺材也买不起，就用家里的一領破炕席，把奶奶发送出去。我爹对我娘說：“这里沒俺穷人的活路了，凭五尺高的汉子怎么拚命也混不出吃穿！干脆挑灶，闯关东去！”

闖 关 东 去

闖关东，也得有点路費啊！可是，我家那时东湊西湊，只湊够能买几个燒餅的七吊錢。借，向誰去借呢？爹一跺脚，把我的两个姐姐装进挑筐里，对娘說：“七吊錢，也要闖关东！”就这样，一家人含着眼泪，离开了祖居的相邸村。那时，正是一九一一年的春天。

我爹和娘抱着一种离家越远、希望越大的念头，忍饥挨餓，沿途乞討，向遙远的关外走去。我那小脚的娘，每天都忍痛走上几十里路。到了晚上，因为沒錢不能住店，我爹和我娘摟着我两个姐姐，不是睡在店門口，就是睡在荒山破庙。有时为了赶路，错过了村庄，就露宿在路旁、河边、桥下、山洞子里。风吹雨淋，从来沒有睡过一宿好觉。

走出山海关，爹逢人就問：“哪个地方生活能好混些？”問来問去，听人說：奉天（沈阳）一带不錯。在往奉天赶路的途中，路过一个小城镇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餓得哭叫起来。为了討点剩飯充饥，爹和娘剛迈进一户財主家的大門坎，迎面站出一个管事的喊道：“出去！这是你們臭要飯的进的？”娘哀告說：“俺是逃难的，你可怜可怜孩子，好几天沒吃飯了。”那家伙說：“不行！”这时又走出一个挺着肚子的胖子，指着管事的說：“少廢話，把狗放出去！”管事的呼喊一声，突然窜出两条大黑狗，張牙舞爪猛扑过来，爹护着娘和姐姐急忙往門外跑，可是他的两条褲腿

已經被狗撕破，腿被咬出了窟窿，鮮血流了出来。爹咬牙切齿地說：“这里財主太可恶了。走！去告他一狀。”一位过路的赵老伯走过来劝道：“忍着吧，走到哪里也沒有咱說理的地方。沒有錢你告不倒他！”那位好心的赵老伯把我們領到家里吃了一頓飯，并告訴我爹說，通化那里地多人稀，日子好混，你們到那里去試試吧！爹和娘向他千恩万謝，就奔通化而去。

越 逃 越 荒

从关里到关外，从山东到通化，經過两个年头，一路受尽了苦，爹和娘不想再走了，就在孤磴子村住下来。村里姓孙的地主找爹說：“你們抛家舍业的，剛来到这里不容易安身，我租給你們几亩地种吧！”他还說，秋后接收的粮食交一半租子。爹答应了。爹是个庄稼人，不分昼夜，精耕細作，又加上那年风調雨順，秋天收成很好，除交上对半租子，余下的粮食还够一家人填飽肚子。可是第二年，地主把地租定死了，不管年景好坏，收多收少，一律按第一年交租的数量收租子。我爹明知道干不得，可孤磴子村一带的土地都是姓孙的，不种他的又种誰的呢？就硬着头皮种下去了。結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天不是旱，就是涝，年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沒了吃的。沒法儿，我爹一气之下退了地。

一九一九年春，我家搬到通化小龙爪沟屯。在这里，又租了地主刘和亮的两垧山地，年租六石。头三年还对付能过

活，到了第四年，剛鏟完頭遍地，就下了一場冰雹，緊接着又遭了一場大風，秋後歉收。狠心的地主怕我們交不上租，在打場時，就派人守着場院，把剛打下的糧食都拉走了。爹一看，這里也活不下去，又把家搬到月牙泡村，租種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地，過了三年，生活照樣過不下去，就又在二六年冬天，逃到了撫松縣。

當我家來到撫松縣的刁窩覆子村借宿時，被一個外號叫姜聾子的地主知道了，他花言巧語地勸我們住下來，給他種地。他答應租子一定收的低，還借給我們糧食吃。第二天又領我爹去看了地，他說：“這三垧地，土質肥，保險長好莊稼；我只收你八石地租。”當時大雪蓋地，沒法看土質，也沒有實際丈量，我爹就信以為實地答應下來。等到冰雪融化後，一看，全是沙崗子地，土質很壞，爹忙去找姜聾子，誰知這家伙眼睛一立楞，不但不承認騙人，還要賴說：“當初講的就是這塊地，地又是你看中了的，八石租子已經講好，不能改。”我爹說：“那俺就不種了！”他奸笑着說：“不種？沒那麼便宜，不種也得拿租子！要不咱們就進城打官司。”我爹一想，沒有錢的官司，上哪兒贏去，就忍氣吞聲地種了。泥一把，汗一把，辛勤地薅弄到秋後，只收了七石糧食，還沒夠交租子的。當時村里一些窮哥們見事不公，就推選出一位老農民崔兆德出面求情，要求姜聾子減減租子。可是他一邊抽着大煙一邊說：“春天講妥，兩相情願，要不他能種嗎？”崔兆德說：“年景不好，你就可憐可憐他這逃



荒人吧。”好說歹說，由他担保，姜聾子才答应欠下的租子緩交，結果两年后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賬！

就在这时候，我三叔王秀成也为生活所迫，由山东逃到关外，找到了我們。爹和三叔商量到老林子里开一块地，省得老是受地主的欺凌。我們就把家搬到了离三道庙岭村四里远的前趟子，挑选了一块林子，全家动手，盖了两間地埕子住了下来。我爹和三叔两人在大雪沒膝的林子里砍树、放树，春天光着脚刨树根、打弄土、耙平地，好容易把地刨成

了壟，开出了一垧多地。全家人心里都觉着这回行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了。可是，清明刚过，全家人正高高兴兴地播种，突然来了三个骑马的人，身上都带着手枪。这三个人横眉竖眼地指着爹问：“你们敢在这里随便开荒，问过谁？”爹说：“这个沟坡子没主。”这时，一个满脸长胡子、穿着缎子长袍马褂的矮胖子奸笑着说：“没主，这是什么？”说着拿出一张“隔山照”一念，原来象这样荒无人烟的老林子，也在地主老财的魔爪下控制着。这时，一个家伙上前来说：“全三道庙岭的山林土地都包给我们张掌柜的了，谁人不知？”我爹问道：“地已经开出来，怎么办呢？”大胡子哈哈大笑，说：“我张平之向来仗义疏财，公平处事。既然你们已经把生荒开成熟地，就自管种好了，七年之内我不要你一粒粮食、一文钱。如果你们愿意开，还可以接着开，你看如何？”我爹不知这里边的鬼道道，以为这个张掌柜当真是心慈面软，便向他再三道谢。

自古以来，就找不出一个地主不喝穷人的血的，大胡子张平之为什么霸了地，又让人白种呢？后来才明白，这个地区由于地势高，气温低，新开垦的土地发凉，头几年庄稼长不上来，第五、六年土质才变暖，第七年才能发挥地力。尽管这样，爹和三叔并没有灰心，他们精耕细作，很快地改变了土质，第四年就获得了好收成。因为不交租子，我家粮食算是够吃了。

谁知，我家刚吃上顿饱饭，地主就眼红了，第五年开春，张大胡子的李外柜来找我爹说：“张掌柜的生意不好，

外賬又多，从今年开始四六收租子。”三叔說：“当初講妥七年后交租，現在不能变。”李外柜將臉一沉說：“空口无凭，拿字据来！”我爹一算，四六租子太重，恳求他：“租子重，減一減吧。”他不耐烦地說：“掌柜的吩咐，不干就收地！”就这样，張大胡子凭着那張“隔山照”，沒費吹灰之力就把爹和三叔一滴血、一滴汗开了四年才开出来的三垧多地夺了过去；沒过几天，又把这地卖給了另一个地主，賺了一笔好錢。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們又搬到东崗乡高家堡子屯。全家动手又在大林子边上盖起了两間地槍子，住下了。可是，这里的山林土地也都是归几戶大地主所有，他們手里也都有象張大胡子那样的“隔山照”。找不到沒“主”的地方，爹和三叔便在大地主尹秃子尹启山的林子里开垦了三垧多地。我那年十四岁，就給尹秃子放猪，当半拉子。

家 破 人 亡

我三叔王秀成，剛到关外时，身板还挺結实。可是，經過这几年的劳累，就一天不如一天，終于积劳成疾，起不来炕了。为了給他治病，我爹向財主厉伍先抬了五十元印子錢（高利貸），利息是大加一。当年秋天沒有还上，就欠上一百元。第二年秋又沒还上，本利一齐滾，变为二百元了。狠心的財主見我們第三年秋也还不上債，就硬把我娘喂养的一口一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赶走了，这还不算，又将俺家收获的所有

谷草（四千多斤）全部拉走。这件事，給我正在生病的三叔打击很重，他又气又心疼，病就更加重了。那时山沟里没有一个治病先生，重病要送到县城去治。去一趟县城非常不容易，得穿过一百多里路的老林子，还要花不少錢。三叔說啥也不让送他到县城医治，他說：“再欠下債，就是我病好了也掙不出利錢呀！”就这样，沒过几天，我那沒儿沒女的三叔，年仅四十岁就离开了人世。爹和娘忍着悲痛，把他埋在长白山下的老林子里。

三叔死了不久，轉过年我五岁的小妹妹也得急病死了。全家人的眼泪还没擦干，不久，我的十岁的弟弟王宗祥給地主放猪时，又昏倒在树林里，抱回家来，他两眼发直，光吐黄水。爹和娘急着想再借点印子錢，把他送到县城去医治，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小弟弟就咽气了。

前后不到两个月，穷和病，夺去了我家三口人的生命。

一灾刚过，一禍又来。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豺狼的爪子伸到了长白山下，从此，更大的灾难临头了。万恶的日本强盗，为了割断山区人民同抗日联軍的联系，到处放火烧房，施行了并屯政策。

一天下晌，日本守备队来到屯子里，不容分說，就把我家的房子給点着了，全家人冒着濃烟烈火，好不容易才搶出一点东西。万万沒有想到，这天晚上，屯火未熄，泪未干的时候，又来了一股如狼似虎的土匪，趁火打劫，他們又搶走了我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遮体的破烂衣裳。真是家破人亡，

走投无路啊！

經過这一連串的打击，我爹成天愁眉苦臉，逐漸郁悶成疾，沒过半年，就一病不起了。因为沒錢，請不起医生，所以，沒过多久，爹就死去了。

我爹死后，靠我打柴換錢，母子二人过着饥一頓、飽一頓、糠一頓、菜一頓的生活。在八年风雨不誤的打柴生活中，由于时飽时饥，我得了严重的胃病，靠打柴不能維持生活了，又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搬到东崗村，在地主陶元德的西小山开垦土地。在这期間，吃不飽、穿不暖，拚命帶病干了一冬一春，开出了二垧三亩地，可是我又因此得了支气管喘息病。沒办法，我娘又挎筐提棍挨門乞討，不久也得了病，一到冬春就咳嗽个沒了。我娘时常叨念：“这苦日子多咱能熬出头来呀？”

苦 尽 甜 来

好容易又过了三年貧困生活。到了一九四五年秋天，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晴天一声霹雷，领导穷人翻身的救星共产党来了。以后，村上成立了农民会，我当上了民兵，拿起枪杆子，斗倒了地主。我在西小山亲手开的地也还了家。我和娘到地里去埋完木桩子，也不知是喜欢还是悲痛，娘俩哭了起来。土地改革的第二年，我盖了三間新房子。一九四七年，我三十一岁才成了家。

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我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公社一成立，因为我身体多病，社員們不让我干重活，选我当了仓库保管員。由于党的领导和有了人民公社，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娘常对我說：“在早那日子象地獄一样，說不完的苦。現在的生活象天堂一般，說不尽的甜。”

如今，我已有了四个孩子。三个大的都上学念书了。这一代人，是在幸福生活中长大的。他們再也不会象我們过去那样为苦日子操心，再也不会拿起小鞭子給地主放猪、放牛，再也不用挎篮提棍挨門討飯。每逢我看到孩子們蹦蹦跳跳、欢欢乐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一想起过去，就使我更爱今天的新社会。我心里想：一定好好干，把咱們的国家建設得更好，让子孙代代过好日子。

两代血泪仇

吉林省汪清县百草沟公社西城大队 宗玉海 口述
第一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小组组长

樊万清、石立学 整理

我老家在河北省。在旧社会，祖祖辈辈都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我爹二十岁那年，爷爷、奶奶就被穷日子给折磨死了。为了找一条生路，我爹就闯关东，来到吉林省汪清县百草沟，投奔到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宗玉堂家。可是，宗玉堂发了财，不认亲了。他虽然假情假意地把我爹收留下来，却把我爹当成了他的奴隶。什么重活都让我爹干，一个工钱也不给。我爹一提工钱，宗玉堂就说：“桃不好，杏（姓）好。一家人还提什么钱不钱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不能亏待你。”就这样，我爹光吃饭白干活，给他家干了十几年，没拿到一文钱。

我四岁那年春天，我爹因为起早贪黑，劳累过度，得了“火眼”，两只眼睛红肿，不能干活了。要治眼睛，家里又没钱，我爹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宗玉堂。宗玉堂却板着脸，蛮不讲理地说：“你也不好好想一想，这些年，你吃我喝

我，現在又來跟我借錢？哪有錢借給你！”我爹說：“我拚死拚活地給你干了這麼多年，一點工錢也不給，還說我是白吃白喝；如今我累病了，借兩個錢看看病都不行啊！我這不成了你不花工錢的伙計啦！”說完，轉身就走了。宗玉堂一看我爹眼睛壞了，再不能給他賣力了，就在一天晚上把我們一家五口人（我爹、娘、哥哥、姐姐和我）攆了出來，連個飯碗也沒讓拿。

—

我們一家人被宗玉堂攆出來以後，連夜趟過嘎牙河，來到百草溝東山腰的一個小溝里。這兒附近沒有人家，滿山都是大柞樹。我爹就砍了幾棵樹，壓了個小馬架子住下來。爹娘核計着：“這個山坡沒主，咱就在這兒開點荒，對付着活命吧。”從這以後，爹和娘便起早貪黑地干起來。每天天剛放亮，我爹就扛起鎬頭上山；天亮之後我娘把我們哥幾個安頓好，也上山刨地；天黑了，他們也要再刨上一氣。當時，我們家吃的全是从山上挖來的野菜，采來的野果。但是，為了活命，我爹娘咬着牙，挺着干。总算刨出了三畝多地，又到山下借了種子，把地種上了。由於爹娘的精心蒔弄，庄稼長得好，籽粒也上得很足。到秋後，一家人割的割，挑的挑，把庄稼弄了回來。正當一家人忙着收糧的時候，災難又來了。

有一天晌午，一伙穿長袍馬褂的人，闖進了我們家。其

中一个瘦猴子臉的人，用“文明棍”指着我爹的脑袋，瞪着眼睛說：“你这个穷光蛋，誰叫你在这儿开荒盖房子？噫！破坏了我家的风水！”其余的家伙也帮腔：“把他捆起来！”我爹說：“老爷，这个山坡沒有主哇！”沒等我爹把話說完，瘦猴子臉那个人举棍就打，并恶狠狠地說：“好哇！你想造反！山坡沒有主？我孙宜昌的棍子指到哪，哪就是我的！”打手們一看主子动了手，也拳打脚踢起来。我們几个小孩，在一旁吓得哇哇直哭，我娘苦苦哀求。孙宜昌一看，时机已到，臉上露出了一絲奸笑：“噫，我最可怜象你們这样的穷人，方圆百里，誰不知道我孙善人。好吧，看在这些光屁股孩子的面上，房子你們可以住，地也可以种，不过得按四六交租。快把今年的租子送去！”我爹說：“开生荒都是三个茬（种三年）以后才交租哇！”孙宜昌又繃起臉来吓唬說：“你胡說！这是我孙家的規矩，哪个敢破格不交租，我就抄他的家！”說完，他把“文明棍”一揚，由打手們前护后拥地离开了我們家。剛打完場，孙家又派狗腿子来催租。好不容易收了八百多斤粮，白白地让他們逼去了一半。

第二年春天，家里又沒吃的。我爹被逼无奈，就到百草沟用大加一的利抬了富农李德录三百斤粮（秋后还六百斤），一頓粮一頓菜地对付着开荒种地。

就在这年，孙宜昌将我爹开起来的几亩荒地，卖給了恶霸地主張兰义。張兰义对穷人更狠，手段更毒。他剛把地买

到手，就派狗腿子来逼着我爹加租子，非把“四六”租改成对半分不可，若不就收地。没办法，我爹只好答应对半交租。可是，到秋后，張兰义亲自来收租，他为了从我們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硬說他的山場不准別人随便开荒种地，叫他手下人把我們打下的粮食全都搶走了，小馬架子也給扒了，連鍋也給拔了。我爹娘百般阻拦，但招来的只是一頓又一頓的毒打。我爹一看，在这沒法再住下去了，就忍痛离开了自己一畝一鎊刨起来的荒地，搬到百草沟街边上住下来。

在这里，生活照样不好混。富农李德录經常到我家来逼債，要那六百斤粮。連糊口的粮食都沒有，哪有粮去还賬呢？我爹被逼得实在沒办法，就去給卜家打短工頂賬。一直干了大半年，才算还清了这笔冤枉債。

二

我六岁那年，爹和娘又領着我們离开了百草沟，搬到十里外的窟窿山根儿底下。由于憋气窩火，我爹的眼病越来越重，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了。扛活、打零工都沒人要。没办法，我爹只好把大哥玉明送到三十里外的牡丹川給地主高振鵬放猪，爹領着我出去要飯。

要飯真难哪！穷哥們有心帮忙，帮不了。地主老財黑心腸，他們不但不帮，还經常放出恶狗伤人。我們爷俩不知叫狗咬了有多少回！記得，有一年年关将近的时候，我爹領着我，頂着大雪，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到牡丹川去要飯。我們爷

俩在一家地主的門口剛一停脚，黑了心的地主就把他的恶狗放出来，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撕碎了破褂子，咬伤了后背。我爹一看我被狗咬了，一着急，举起棍子就打了一下。这时，从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恶狠狠地指着我爹的鼻子尖骂道：“他媽的，你这个臭叫花子，胆子可真不小哇！敢打大爷的狗？快給我滾！不滾，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爹知道惹不起人家，只好忍气吞声，背着我回家啦。

为了維持全家人的生活，带出一張嘴去，我八岁那年，爹娘就把我雇給一家姓王的富农去放猪。当时，我們家要吃沒吃，要穿沒穿。我在外面放猪，沒有衣服也沒有鞋。夏天还好对付，可是一到秋天就遭罪了。我爹看我挨冷受冻，心里很难受。他想給我用破烂东西縫个破褂子穿，可是，家里連条綫也沒有。我爹去求东家，东家說：“那好办，我家有麻秆，你抱点去，剝点麻，不就縫上了嗎。”我爹就抱点麻秆，剝点麻，給我縫了一个破褂子，圍在身上。可是，脚上仍然沒有鞋穿。秋后，每天早晨都有霜冻，脚一沾地，扎骨似地凉。一看见猪拉屎、撒尿，我就赶忙跑过去，站在上边捂捂脚。脚上冻裂的口子，天天往外流血。

放猪回来还得給东家打零杂，什么活都干，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一不順东家心眼，我就得挨一頓暴打。有一次，我放猪，跑丢了一只猪崽子，东家就把我好个打。

冬天，我爹到东家給我算賬，以为我能掙到几个錢。可是，东家的算盘一响，不但沒掙着一文錢，反倒欠了他們的

錢，硬逼我爹答应叫我再給他們白放两年猪。我爹就問：“我孩子干了一年，沒掙着一文錢，还倒欠了你們的錢？”东家却說：“別他媽裝糊涂，你那个小崽子在我这吃了一年不算，还給我丢了一只猪崽，秋头子你在我家还拿了两塊錢的麻秆。加在一起，他掙的那点粮能够嗎？嗯！”我爹說：“那捆烂麻秆当初不是送給我的嗎？就算是借的吧，能值那么多錢嗎？兩塊錢可能买二斤好綫麻呀！”富农說：“怎么，你他媽想不认賬啊！咱們打官司去。”这不明明是訛人嗎？人家有錢有势，惹不起人家，无奈，我爹只好答应叫我白白地給王家再放两年猪。

三

一九四二年，鬼子实行并村政策，我們只好搬到了我哥哥扛活的那个地方——牡丹川。

这年，我已經十三岁了。我哥哥領着我到地主高振鵬家去讲劳金。高振鵬为了从我們哥俩身上榨取血汗，就假惺惺地說：“看你們老的老，小的小，怪可怜的。你們哥俩就都在我这干吧，亏不了你們。一年給你們哥俩带上七亩半地，就够你們一家人吃了。”其实，他指的七亩半地，全是黄土崗子，最多也打不了五六百斤粮。可是当时我們哥俩哪知道哇！所以，就讲妥了：我哥哥当半拉子，我放牲口。誰知一进高家的大門就变了。哥哥名义上是半拉子，实际上干的是整活。我呢，除了放牲口，还得給他們抱柴、引火、燒水，

一天沒有閑時候。雖然住在一個屯，可是想回一趟家都不行。

當時，我娘正病得厲害。娘是因為生孩子作了病，由於沒錢治，越來越重，最後癱瘓了。我爹也由於着急上火，雙目失明了。他們都需要有人照顧。可是，高振鵬却總也不讓我們哥倆回家。就在這年五月初四，我弟弟玉江連哭帶跑來到高家，告訴哥哥，娘死了。我哥聽說娘死了，轉身就往家跑。好歹算湊了幾塊破木板，給娘做棺材。可是板子太糟，釘不住釘子，就只好用舊鐵絲橫三豎四地捆上。當天就把娘埋起來了。晚上我放牲口回來時，連娘的尸首也沒看着。

我娘死后，我爹又病倒了。一天晚上，我偷着跑回家來看我爹。爹已經不行了，他上氣不接下氣，說話都很費力了。爹把我叫到跟前，面對着我，流着淚，斷斷續續地說：“玉海，我快不行了，往後你們自己闖吧！”天剛亮，我就急忙回到高家。一進門，正碰上高振鵬，他張口就罵，並立即逼我出去放牲口；我沒敢吱聲，就急忙趕着牲口上山了。晌午回來剛想吃口飯，忽然聽說爹快要死了，我一口气跑到家，一看爹已經咽氣了。他穿着遮不住體的衣服，光着腳，直挺挺地躺在門外的一塊破板上。我一下子撲到爹的身上，哭了起來。

四

爹娘死后，就剩我們哥三個了。沒有別的法子，我弟弟

玉江也只好跟我們一起去給高振鵬扛活。哥哥下地当长工，我还是放馬放牛，弟弟当猪倌。哥三个扛活，家里还是要吃沒吃，要穿沒穿，一年到头連一个錢也見不着。我滿山遍野地放牲口，連双鞋都沒有，两只脚扎得沒有好地方。这还不算，还得經常地挨打受罵。有一天，我在山上放馬，突然下起大雨来，又是雷，又是閃，馬受惊吓，炸群了。我正在往一块圈馬的时候，一匹別人家的馬混了进来，把高家一匹馬的脖子咬伤了。晚上，高振鵬一看就火了，板着铁青臉罵道：

“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把馬咬成这个样子？啊！不許你吃飯！”我剛想申辯，高振鵬举起棍子就打，“啊！你还敢跟大爷頂嘴？告訴你，端我高家的碗，就得服我高家的管！”

第二年夏天，我得了一場伤寒病，一个多月不能下地。剛剛能走动，高振鵬就逼着我下地干活。我只好咬着牙去赶犁杖套。干了一会就累迷糊了，昏倒在地上，大腿被牛蹄子蹠了个大口子，一勁地往外流血。回到高家，我的腿就肿起来了。高振鵬不但不給治，还說：“不要紧，沒伤着骨头，用不着歇了。”硬逼着我一瘸一拐地挺着干活。結果，伤口化膿了，一直烂了两个多月才好，至今还有一条长长的伤疤。

五

一九四五年，家乡解放了。我們哥三个才算出了苦海。

一九四七年，在党的领导下，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斗倒地主和恶霸，我伸了冤报了仇，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解放后，我们哥三个都结了婚，成了家。哥哥现在是仲安公社大松树大队第一队副队长；弟弟是石岘公社下嘎小学校的教师；我是百草沟公社西城大队第一生产队贫下中农代表小组的小组长。我经常和贫下中农一块研究集体生产的大事，协助生产队干部进行工作。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我家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我常常想：“若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救了我，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贫下中农，要永远记住过去的苦和恨，永远跟党走，握紧印把子。”

牢記階級仇

黑龍江省明水縣興仁供銷社 邢殿玉 口述
黨支部書記

中共黑龍江省明水縣委宣傳部 記錄整理

在舊社會里，我們貧苦農民，不僅受盡了地主、富農的剝削和壓迫，還得受日本鬼子、警察和漢奸的迫害。真是三座大山壓在身上，叫人喘不過一口氣來。我就被地主害得家破人亡，接連三次被抓當勞工，真是九死一生，險些喪了性命。

一

我老家住在吉林省榆樹縣。我五歲那年，爸爸給地主張三猴子拉粉，一條老驢病死了，張三猴子硬說是我爸爸給整死的，把他攆了出來。再加上那年鬧水災，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聽說北大荒好混，全家就在十冬臘月來到了黑龍江省明水縣。先是落在李家屯，要吃沒吃，要燒沒燒，連討帶要過了個年。轉年就搬到王雲屯。爸爸不是給地主拉粉、做豆腐，就是給地主扛活。我從八歲起就給地主放豬，十五歲就扛半拉子活了。一九三一年，日本鬼子侵入東北，兵荒馬亂。當

时，媽媽正鬧病，我和爸爸把媽抬在荒草甸子上的壕沟里避难，藏了两天两夜，抬回来就死了。

爸爸漸漸老了，我也长大了，以后全家的生活担子主要落在我的肩上。

一九三七年，我們全家四口人，爸爸已經六十多岁，再就是我的老婆和一个四岁的儿子。这年我給地主薛景山耨青，我出人力，用他的牛犍，种他的地。春天讲的是：我給他种八垧黃豆，到秋分給我两垧。我們一家老小，起五更爬半夜，精心地耨弄，又加上雨水調和，庄稼长得特别好，每垧足能打七、八石。薛景山一看庄稼长得好，就紅了眼，黑了心。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說：“你种那八垧地，粮食都由我收，你就算給我扛了一年活，我也亏不着你，工錢按打头的給你。”我一听他要变卦，忙說：“咱們春天不是讲好了嗎？怎么你又……”还没等我把話說完，他就把臉一拉拉，說：“邢殿玉，你可要知道，使我的牛犍，住我的房子，咱們可得好好算一算。”

就这样，薛景山蛮不讲理地按扛活的劳金計算，又扣了房錢和牛犍錢，只给了我几个現錢和五斗谷子。我們一家人强对付着吃到轉年开春，就揭不开鍋了。

这不明明是騎在穷人脖子上拉屎嗎！气得我咬牙切齿，我要去告状，穷哥們劝我說：“跟他打官司，到啥时候咱都得輸，衙門口是为人家开的呀。”

薛景山是王云屯的恶霸，外号叫“瞎眼邪神”，当十戶

长，加上他的姑夫在拜泉县法院当律师，所以誰也不敢惹他。他到村公所、警察署象走平道似的。我一寻思可也是，咱們一沒錢，二沒勢，光凭一个穷光汉怎能滚过人家，就連身子咱也搭不起呀！我就忍气吞声地干吃了哑巴亏。

誰知薛景山越来越凶，步步紧逼。一九三八年开春，正是我家吃燒皆无，沒法生活的时候，薛景山領着警察李树元来要什么“飞机献納金”。連吃都顾不上，哪有錢交那个玩艺儿。我剛說：“現在沒錢，緩几天再交吧。”薛景山說：“不交，好吧，两口子都跟我走。”他把我們帶到一个大門洞裡，还有十多戶貧苦农民，也都是因为交不起这个捐那个稅而被抓到这里来的。村长郭述仁、警察署长楊小胡子，在甲长刘国良家里吃完飯也出来了。他們罵了一頓之后，硬逼着我們十多戶人家，两口子一伙，面对面跪着打“协和嘴巴”。我們不打，他們就一边罵着，一边左右开弓地打了我們一頓大嘴巴。貧农郭殿臣、常玉山、房連惠等六人，被打得鼻子口流血，昏倒在地上。我也被打得两眼直冒金花。我老婆不肯打我，薛景山狠狠地踢了她两脚，当时她正怀着七个多月的身孕，被踢得倒在地下不能动了。就在这时候，地主、富农的老婆，都出来看我們的热鬧，在一边嘻嘻哈哈地大笑。当时，我和我老婆心里那个滋味就不用說了，又气又恨，恨不得把他們一口吞掉。

我把我老婆扶回家后，她成天躺在炕上哭，不久就早产了。我看着不足月的孩子和我老婆那虛弱的样子，恨透了薛

景山那小子。

端午节前一天，我老婆还没有满月，薛景山家的大黑狗窜进我们家，把我老婆的手和腿咬伤了。由于咬伤和惊吓，我老婆就抽风了，经血不止。穷哥们都为我抱不平，叫我去找薛景山要钱治病。我到薛景山家一说，别说给钱，就是借也不肯借，薛景山皮笑肉不笑地说：“病是不能给治，你乐意咱就打官司去。”气得我真想揍他，可是又怕我老婆着急上火，就忍着气回家了。因为没钱治病，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在农历六月十二那天，我老婆就含恨死去了。我老婆是被地主薛景山害死的，这笔血债，我一生也忘不了。

当时，我家连吃都吃不上，哪来的钱买棺材！屯邻都知道我老婆是被薛景山害死的，他们就去找薛景山说：“事到如今，你就把牛槽借给他改个棺材吧。”薛景山见屯邻都出来说话，就说：“要借我不借，核三十元钱卖给他。”就这样才算把老婆成殮出去。

老婆死后，我家象塌了半边天，看看老的，再看看小的，我心真象油煎似的。家里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只好把刚生下的小姑娘送到姨娘家，不久，因为没奶吃，死去了；把小儿子送到哥哥家，第二年出麻疹，没钱治也死了。

我一心想报这杀妻灭子之仇。薛景山也明知道我不能善罢甘休，就更狡猾的使了个软招子。他对我说：“邢殿玉，别难过了，人活百岁总有一死，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呀！王铁嘴（算命瞎子）常说，人怕犯‘六冲’‘四绝’。你比你老婆

大六岁，这不正是犯‘六冲’，小姑娘是立夏生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生人这是犯‘四绝’呀……”当时我虽然还没有认识到他是用封建迷信来麻痹我，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要不是他踢了我老婆，孩子就不会早产；要不是他家的狗咬了我老婆，她也不会抽风死去，孩子也不会死。……当时，我又恨又气，火冒三丈：“你把人害死了，还有啥可说，今天咱就算算这笔账！”我爹听他说这些话，也火了，从炕席下抽出大月牙刀就要砍他。薛景山一看势头不妙，就一边往外出溜一边说：“反了你们了，大白天敢行凶！”我也拎着大斧把赶了出去：“姓薛的，别欺人太甚，我邢殿玉不报这个仇决不算完！”薛景山跑出老远了，回过头来说：“那好，咱们就走着瞧！”

没过几天，薛景山就来撵我们搬家，不搬就要把锅拔掉扔出去。他还逼着我那三十元牛槽钱。我哪来的钱呀！死逼无奈，只得把家里仅有的一床旧毡子和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折合二十三元给他了。剩下的七元钱，是我后来给人家挖壕沟挣的钱还上的。

薛景山害得我家破人亡。万般无奈，我爹去给地主杨喜看场院，光吃饭不要钱；我出去给人扛零活，勉强挣碗饭吃。

二

我虽然每天在外扛活，但并没有忘记薛景山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把月牙刀磨得锋利，准备遇着机会宰了薛景山，烧了他的家。薛景山虽说有钱有势，可也怕我这条光棍汉子，

因此，他明害暗算，总想把我整死，免去他的后患。

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要劳工。那时人们一听到“劳工”这两字，头发茬子都发簪。劳工营，是受酷刑的地方，是喂狼狗的地方，是被活埋的地方，……总之，那是有死无生的地方呀！薛景山早就把我恨之人骨，哪能放过这个杀人的机会。四月十四那天深夜，我正在炕上躺着。外边狗咬嘈嘈，一阵脚步声之后，门被踢开了。薛景山领着两个自卫队员，闖了进来，五花大绑地把我捆起来。我挣扎着，喊着：“你们为什么绑人！”“为什么抓我去当劳工！”

就这样，我便开始了第一次劳工生活。

这次当劳工是在北安城东日本鬼子的九八三部队仓库做搬运工。

仓库的周围是一道很密的铁丝网，外面还有一层电网，一进门的的地方有鬼子兵持枪把守着。为了防备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劳工逃跑，我们的衣服背后都缝着一块半拉月亮似的红布。进了这道鬼门关，谁都不知道是活着出来，还是死了抬出来。

我们住的劳工棚子和瓜窝棚差不多。顶上苫着两领炕席。里边就地铺上一点草，就在这上睡觉。到了夏天，一遇到连雨天，棚子就漏，又潮又湿。冬天，不给生炉子，也不许攏火，早晨起来被头上就是一层白霜。许多人都冻出病来了：有的腰腿疼，有的得了尿淋……，得了病，日本鬼子不但不给治，还逼着出去干活。我们劳工吃的是掺着橡子面做的窝窝头，一顿两个，晚上那顿干脆是一碗糊涂粥。吃饭前

也有个洋罪够遭的，日本鬼子叫大伙先把饭菜盛好摆在临时用板塘的长条桌子上，然后规规矩矩地站着，让大伙背什么“诏书”“国民训”，谁的嘴唇不动弹，不是挨骂就是挨打，有的人就随着话音骂他们。

我们干的活，又重又累，每天在食品库里扛八十斤重的糖袋子和六十斤重的饼干箱子。干活有鬼子和劳工队长监视着，走慢一点就挨打。吃不饱，活计重，干活时间又长，天天这样干谁也顶不住。

有一次，一个劳工砸开了一个饼干箱子，大伙吃开了。鬼子发现这件事，问我们都谁吃了，当时谁也不承认。鬼子就把我们集合在一起，挨个验牙，有十一个人被发现了，鬼子就挨个打，追问谁是领头的。大家谁也不肯说，鬼子就用锁把挨个打。我们几个还被绑在板凳上，往嘴里灌煤油，灌得我们鼻子口往外流血。

从这以后，鬼子就把我们调到马料库去扛袋子。我们成天扛着一百八十斤重的马料袋子，在两丈高的跳板上走。走得慢、上得慢，就要挨打。一到冬天，活更难干，早晨跳板挂了一层霜，人一上去就打滑。有一天，往垛上扛高粱袋子，走在我前头的一个姓庄的老乡，从跳板上摔下来。我也慌了手脚，腿一软也接着摔下来，我在他后边，离地近，比他摔的轻得多。我忍着疼痛爬起来一看，他的脑袋已经摔坏了，脑汁和鲜血直往外流，不一会儿他就断气了。在场的人都落泪了，没有一个人不恨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把尸体捞

走后，又逼着我們繼續上跳板。我穿着一双破猪皮靴，冻得棒棒硬，只好把靴脫下来，用破衣服包上脚，踩着扎骨头凉的跳板，咬着牙往上走。

我这期劳工整整干了九个月，到一九四〇年一月才回来。

誰知地主薛景山要害死我的心还没死，在我回来一年多后，即一九四一年六月，薛景山又叫我去出劳工。我問他：

“我已經去过一次，凭啥还叫我再去？”他帶答不理地說：

“这是上边指派的，叫誰去誰就得去！”他借着“上边指派”来压我，死逼无奈，我第二次去当劳工。

这次是在北安西門外給鬼子修飞机场。活儿更累，生活更苦。修跑道的时候，成天抬大木头，背石头。不几天，大伙都累垮了。衣服都破得滴拉倒挂的，没办法就把水泥袋子套在身上当坎肩穿，天气热，一出汗水泥就沾在身上，火辣辣的痛。扛袋子、背石头，一揉搓，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肉皮。鞋破得不能穿了，就光脚丫在碎石头上走，划的口子一个挨一个，直往外淌血。

后来鬼子又叫我們修工事。那可就更危險了，能活着出来，真算拣了一条命。修的这个工事是象半个馒头形似的地堡。鬼子不叫一伙人干到底，是分批分期干。头一批打地基，第二批是修上盖，听別人說第三批是在里面挖两丈多深的坑，装上铁管，管子里面还要装些什么东西，再灌上水泥。我們是第二批，修上盖。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人往上抬三角木架子，很不好抬，一下子我們三个从頂上都摔下来，其

中有个姓范的老乡，正好掉在水泥柱子上面的鋼筋上，腸子都刷出来了，当时就死了。我俩的后背也刷了挺长一道大口子。还有一次，上盖的水泥剛灌上几天，还没凝固好，日本鬼子逼着我們往下拆盒子，一下子塌下来两間房子那么大一片，压死了八个人。

更惨的是最后安铁管子那些劳工，看来都不是本地人，他們把这个活干完都不見了。后来才知道，鬼子为了保密，把这些人过了电，拉到“炼人炉”或城北“恶狗圈”去了。有一次我亲眼看見用馬車往外拉人，身上都蒙着被，赶車的都是日本鬼子。这是多么殘无人道的罪行啊！

这回我又过了将近七个月的劳工生活，到一九四二年一月才回来。

我第二次当劳工回来以后，狠毒的薛景山又使出一个新的毒招来。他借换发“身份证”为名，把我的“身份证”給收上去了。当时，沒有“身份证”的人不敢到外地去，怕被日本鬼子抓“浮浪”。这真逼得我寸步难行，只好在左近扛零活。

一九四三年，鬼子要的劳工比以前更多了。可是地主、富农不是甲长就是十戶长，再不就是甲长、十戶长的亲戚朋友。他們不但不去当劳工，而且也不肯花錢雇劳工。于是，他們就在我們穷人身上打主意。农历五月二十九那天，薛景山又把我抓去替他們当了劳工。当时，我爹可真气极了，就去找刘甲长說理，刘甲长“哼”了一声說：“我怎能管得了……”一手杖就把我爹推个趑趄。

农历五月二十九，所有被抓的人，都被赶到兴仁村公所所在地的小学校的屋子里。村长孙大馬棒“訓話”后，接着，問誰有困难。一个叫姜貴的說：“我有困难，眼睛有毛病。”警察把他拽出去，綁在旗杆下，用磚头蹭眼睛，几下子就蹭血潤了。还有一个姓張的老乡，臉上貼一块膏药，警察硬說他装病，叫他跪在磚头上，还一个劲地用磚头往他的头上磕，把磚头都磕碎了。真是殘暴到了极点。打完以后，又把我們十几个人綁成一串送到县城里，然后又把我們送到克山，推进“悶罐車”，运到孙吳县的鄂雨站。

第三次去当劳工是給日本人打羊草。这滋味就更难受了。草原上的蚊蠓遮天盖日，大燕蠓叮在身上就是一个三角口子，用手一撓，很快就变成膿瘡。

那里沒有井，喝的是河沟里的脏水。喝了这水，很容易得霍乱病，严重的几个钟头后就死掉了。日本鬼子怕蔓延，就把病重的人捞出去，扔在甸子上的野草堆里。誰要一被捞出去，那就沒好了。后来我也得了这种病，劳工中队副孟宪武就叫張景堂、李长林等几个人把我捞出去。他們几个平时和我好得象亲兄弟，不忍心看着我躺在草棵子里死去，就把我藏在深草里，給我揪脑袋、用大針扎胳膊，送窩窩头給我吃。第三天病就漸漸地好了。我拿定了主意要逃跑，我就深一脚淺一脚地往前走，沒想到竟走到了一个日本开拓团的地方。一个鬼子問我是干什么的，我看也瞞不过去，才說是劳工，采蘑菇吃迷路了。他派人把我送回来，我撒謊說病好

了，回来干活，日本鬼子也就信以为真了。

已經到了冬天，可是日本鬼子还不发棉衣服，我們有的露着胸脯，有的穿着破夹褲，有的身上圍着毯子、褥子，冻得渾身直打哆嗦。

头一場雪后，我們都被冻得出不去屋了。大家在工棚子里商量，决定去找日本鬼子宫藤要棉衣。王德武、赵凤林、葛打头的和我，領着大伙到了宫藤家。他問我們来干什么，为什么不干活。我們說：“沒有衣服不能干！”他說：“不干的不好，我找宪兵队来管你們。”我們說：“宪兵队来了我們也不怕！”这下子可把他气瘋了。他一边罵着一边打赵凤林两个大嘴巴。赵凤林拿起房檐下架花用的竹竿子向宫藤打去。大伙也都一哄而上，你一手我一脚，打得他滿臉是血，窗上的玻璃也給砸碎了，真是又痛快、又解恨。另一个日本鬼子西川溜到一边去打电话。不大一会儿来个穿黄馬靴的日本鬼子，还带着几个关东軍，坐着大票車来了，把我們集合在一起，排成一队，用鈔刀把挨个打。当时，赵凤林和王德武两人被抓走了，被鬼子打得皮开肉綻，过了好几天才放回来。后来，鬼子怕我們再鬧事，影响打羊草，就把更生布做的棉衣发下来了。

我这次当劳工回来，正是农历臘月二十五的深夜。我到屯西头姐姐家去叫門，敲了半天才把我姐姐和外甥女敲醒。姐姐在屋里問：“誰呀？”

“我是殿玉。”只听小外甥女說：“媽，是我老舅，快

開門吧！”姐姐說：“哪來的你老舅，他在孫吳縣當勞工，聽說早叫日本鬼子給害死了。”正在這時，隔壁的朱良從屋裡走出來問：“誰？幹什麼的？”我忙說：“我是邢殿玉，你不是朱良嗎？”他所出了我的聲音，趕緊走過來說：“唉呀！真是你呀！這可真是大喜！”姐姐和小外甥女一見我真回來了，都哭了。接着又從地主楊喜的場院房子里把我爹找回來，爺幾個過了個團圓的夜晚。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第二年的春天，黨和毛主席派來的土改工作隊，來到了我的家鄉。我興奮地參加了人民的武裝自衛隊，不久又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到各村幫助貧苦農民斗地主鬧翻身。

一九四七年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騎在人民頭上的薛景山被斗倒了，所有的地主富農都被斗倒了。我們貧苦農民徹底翻了身，開始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擔任了黨支書書記。從一九五〇年到現在我一直做供銷工作，前後五次被評為全省商業和供銷系統的先進工作者。這都是黨給我的榮譽。

解放後我又重建了家庭，兒子已經是高小的學生了。

我越想到過去的苦，就越覺得現在甜，工作起來就越有勁。現在我雖然已經五十二歲了，可是我一點也不服老，還要好好地干上幾十年。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出一切力量。

漁人泪

辽宁省长海县獐子人民公社社員 刘悅荣 口述
崔 琪 整理

一

我叫刘悅荣，今年四十五岁，是长海县獐子島獐子人民公社的社員。我的老家原不在獐子島，在什么地方，連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只听他說，我們的祖先是山东人，在旧中华民国的时代，因为抗不住地主的租債，才逃到獐子島来的。在島上，祖輩都給漁霸当漁工。有一年，漁霸彭作新假惺惺地对我爷爷說：“老刘头，你家孩子都长大了，我貸給你們一只船，別人得一千，貸你算八百，你們自己干吧！”我爷爷从小就給漁霸当漁工，劳累一輩子，还是两手空空。心想，自己有条船，总比給別人当漁工强，于是写了八百元錢的一張欠契，向彭作新貸了一只船。哪知道，这張八百元錢的欠契就象一条鎖鏈，紧紧地鎖住了我們一家人，使我們一家成了彭作新的奴隶。我們一家五个强劳动力（爷爷、三个伯父、爸爸）一直干了十七、八年，不但沒有还清

这笔“閻王債”，本加利，利作本，越滾越大，由八百元变成了四千元。这时候，我們家的孩子多，我爷爷的年紀也大了，漁霸彭作新一看沒有多大油水可榨了，就想出了新的花招，把我家仅有的几間破房，加上船和网，一共合了两千元，全部收去頂了債。船沒有了，房子沒有了，还欠彭作新两千元錢債。我爷爷一看日子沒法过了，想来想去，实在沒有办法，一狠心，把家分开了。所謂分家，就是分饥荒，我父亲和三个伯父各分五百元的債。爷爷气恨交加，忧虑成病，不久就死了！这时候，我才两岁。

二

分家后，爸爸在梨树沟租到了一間破房子，才算安下了身。誰知剛安下身，漁霸彭作新就来逼債了。可是，爸爸还没找着活干，就是一家人吃的也还没有，哪来錢还債啊！彭作新說：“要是沒有現錢，那好办，你到我船上干个一年半載的，債也就还清了。”

那时候，海是漁霸的，山是漁霸的，地也是漁霸的，不去，能到哪去？家里吃什么？用什么还債？沒有办法，爸爸只好丢下我們娘俩，到彭作新船上頂債拽饥荒^①去了。

爸爸走后，媽媽就背着我出去要飯，同时向人家攬些縫补洗涮的活計。爸爸拽饥荒領不回工錢，为了我們娘俩能活

① 拽饥荒，用劳动力抵債的意思。

下去，不得不向彭作新借高价粮（当时新金苞米一斗四角，彭作新卖八角）回来吃。这样一来，爸爸也就年年还不清彭作新的饥荒，离不开他的船。后来，妈妈先后又生了我妹妹和弟弟，家里生活就更困难了。为了能活下去，我妈就在她生我弟弟的第三天，就去给附近的人家奶孩子。

这年，我八岁，过年的时候，船上渔霸家贴红挂绿，上香摆供，杀猪宰羊，蒸饽饽、包饺子，可我们家米罐子底朝着天，锅台冷冰冰的，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一家人盼望着爸爸回来，能给我们带些吃的。三十晚上，爸爸从船上回来了，我们兄妹三个高兴得扑到他的怀里。弟弟要饽饽，妹妹要饭吃……，可是，爸爸什么也没有。他看我们一个个张着嘴，就低下了头，难过得直淌眼泪。不懂事的妹妹和弟弟，要不着吃的就爬到炕上哭开了。妹妹弟弟一哭，我也哭了，妈也哭了，我们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哭着、哭着，妹妹和弟弟就睡着了。这时候，远处传来了“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有钱人家过年了。爸爸抬头向窗外看了看，回头对妈说：“仓子他妈，我得到南山去躲一躲，要不彭作新来要债就不好办了。”爸爸又嘱咐我：“仓子，你跟妈妈领着弟弟妹妹过日子吧！”

说着，爸爸从炕上拿起一条破麻袋片，给弟弟盖在身上，然后又脱下他那件破棉背心，给妹妹盖了，含着眼泪，出门到南山躲债去了。

第二天早晨，妈妈叫妹妹在家看着弟弟，我们娘俩就出

去要飯了。出門時，媽媽遞給我一根槐樹棍子，囑咐說：

“孩子，要緊緊攥住它，過年富人家的狗都撒開了，見了狗只能棄，千萬打不得，惹了人家的狗，咱們就得挨他們的暴打！”

那時候，窮人自己都填不飽肚子，哪有東西給我們！我們就到有錢人家去要，可這些傢伙，寧肯把東西扔掉也不給我們。後來，我們來到了島上有名的漁霸蔡大麻子家。我一步跨進了院里，正巧，蔡大麻子從正房里走出來。他看我穿得破破爛爛，手里拎着個破口袋，就繃起麻臉翻着金魚眼珠，怒沖沖朝我走來。他一边走，一邊用兩手掌往外一個勁的擺動：“滾出去！滾出去！”

我站在那裡沒有動彈。忽然，蔡大麻子“呔”的一聲，就從屋裡竄出兩條灰狼狗，張牙舞爪撲到我身上。一隻狗咬住我的左腿肚子，另一隻狗咬住我的右衣袖把我拽倒了。媽媽趕忙上來襲狗，誰知這兩條狗又朝媽媽咬去。我掙扎着爬起來，舉起木棍就要打狗，蔡大麻子一見，連聲喊：“唻唻……”把兩條狗叫了回去。

我沒打着狗，心裡可恨透了蔡大麻子。轉身把媽媽扶出門外的時候，我覺得左腿痛得厲害，一看，腿肚子上被咬出了兩個血洞，流着鮮血。媽媽哭着從衣襟上扯下一條布，給我把傷口包了包，然後，我們娘倆互相扶着回了家。

回到家裡，爸爸在南山躲債還沒有回來，弟弟和妹妹餓得在炕上哭嚎着，媽媽看到這種情景，傷心得放聲嚎啕大哭

起来。左邻右舍的漁工，聞知我被蔡大麻子的狗咬了，又都給我們送来了吃的。有的送来点魚，有的送来点餹餹。就这样，我們一家人，东的东，西的西，躲的躲，伤的伤，受欺挨餓，又过了一个年。

三

一年、两年，爸爸在漁霸彭作新的船上整整拽了十一年饥荒。十一年来，他风里来雨里去，惊涛駭浪，受尽了苦，給彭作新打魚捞虾。一天，爸爸回来对媽說：“咱們那笔‘閻王債’总算还上了二百元，下剩三百元，叫彭作新轉到漁霸石宝山手里了。从明天起，我就到石宝山船上拽饥荒去。”

媽媽叹着气說：“唉！咱們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这年，我十三岁了，看看爸爸，又看看媽，心里难过，就对爸說：“爸爸，我帮你拽饥荒去吧！”

爸爸沒有吱声，寻思了半天，才說：“咱爷俩还这三百元饥荒，总該快些，孩子，你去吧，債少压一天，咱們就能多活一天！”

我們一搭上石宝山的船，就成了他的奴隶，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得出海捕魚，一出海，少則十天半月，多則一个月也不能回家。在海上，夏天还好过点，冬天风吹浪打受苦就更大了。当时，我只穿着条破灯笼褲子，赤着脚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脚被冻肿得象发面餹餹，痛得钻心。可就是这样

的干，漁霸每月每人只給吃三十來斤毛糧。就這点点糧，一頓飯只能吃到兩個小饅頭，搖一氣櫓，出身透汗就消化盡了。

我們在船上受苦，家里媽媽、弟弟和妹妹的生活更苦。記得這是我到石寶山船上的有一年春天，我出海二十多天后才回家。一進門，只見妹妹橫躺在炕上，臉色刷白，象一張白紙。我問媽媽到哪儿去了？妹妹干卡巴嘴說不出話來，只是用手向嘴里指。我明白了，准是媽媽領着弟弟又出去要飯了。我給妹妹掖了掖蓋在身上的破麻袋片，這時，媽媽拎着一個口袋回來了。我一看，口袋里裝的是野菜和爛菜幫子。我問媽媽：“你沒到櫃上去要糧嗎？”

媽媽搖搖頭說：“倉子，咱哪敢去呀！十多天來，肚子里沒進一粒糧食，你看，妹妹又病又餓，都快要死了！”

我看妹妹瘦得皮包着骨頭，鼻子酸溜溜的，扭頭就向石寶山櫃上跑去。一進門，正遇上學徒小張。我說：“小張，你替咱向石掌櫃說說，咱家的人都快餓死了，家里沒有一粒糧，能不能借一點苞米，一升半升也行。”

小張說：“石掌櫃在屋里抽大烟，叫外邊小點聲吵吵！”

我沒聽那個邪，氣憤地說：“他還抽大烟，我們爹倆給他賣命，一點糧都不給，人都快餓死了！”

我的聲音越吵越大。這時，石寶山的爪牙二掌櫃孫瘸子，從里屋走了出來。他狗仗人勢，看我吵吵嚷嚷的，便瞪

起圓溜溜的眼珠子，順手拾过一个盘子秤，朝我打来，并且罵道：“滾！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一看这种情形，再費口舌也借不出粮食来，就只好拎着空口袋回家。因为沒有粮食吃，病又沒錢治，沒过多久，我那可怜的妹妹就死了。

四

当时，我給石宝山干活，他答应一年給我十五元劳金錢。可是，他不給現錢，用“抬”两石苞米来頂工錢。开春时“抬”的苞米，划的是夏季青黄不接时的高价。等到了八月节核一次利息。利再作本，本再滾利，到年底一算，往往是两石苞米划到了三石、四石的价錢。这样，一年累到头，不但掙不到工錢，反而还要欠他的。

在我十八岁那年，年底結賬时，管賬的打开賬簿，手把着算盘扒拉了一阵，然后举到我爸爸眼前，說：“两石苞米本利是三十元，扣去你儿子的工錢十五元，还欠十五元。你儿子使坏了两件网具攤五元賠償費，一共还欠柜上二十元。”

我一听火了，“你們咋算的賬？米价那么高，一年两次利，网具是破的不經使喚，怎么还叫我賠錢？”

他一甩手說：“这是石掌柜叫这样算的，你去問他去。”

那个时候，刀把子握在漁霸手里，去問石宝山，不等于

飞蛾扑火，自討苦吃嗎！沒有办法，我們只好离开了柜房，我們爷俩还得为石宝山卖命。

就是这样，我們爷俩在石宝山船上干了十几年，还是沒有还清那三百元錢的“閻王債”！一九四四年，即日本鬼子倒台的前一年，我已經是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了。十几年来，我受尽了他的压迫和剝削，心里越想越窩囊，越想越憋气，一气之下，我就辞了活，到漁霸刘仁柱船上当了漁工。

当时，刘仁柱叫我們搬到他家的一間房子去住，并答应一年給我二十五元工錢，比在石宝山船上多掙十元。我心想，这回可好了。哪想到，天下烏鴉一般黑，漁霸都是黑心腸。他同样用“抬”粮的办法給算工錢，到年底一算賬，一个工錢不拿，反而欠他几十元。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于是，我提出辞活不干了。这老家伙看我要辞活，就誣賴我偷了他儿子的一件棉背心，并到我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他什么也沒翻着，就伸手把我家的鍋拔下来，扔到院当心：“你們給我滾，我不招你們这个戶了。”

随后，刘仁柱又把鍋台扒了。我气得炸了肺，拎过一条粗树棍子就朝刘仁柱的头頂打去，爸爸猛力推了我一个趔趄，一把搶下我手中的棍子，向刘仁柱說：“你看天快黑了，明天我們再搬还不行嗎？”

刘仁柱歪着脖子，一边走一边說：“不行，赶快給我搬走！”

这时，天已經黑得对面不見人了，上哪去住呢？我們全

家坐在炕上哭成一团。刘仁柱吃完晚飯，看我們还没搬，又走进来把炕刨了。貧苦漁民刘世霞，看我們可怜，就在他家騰出一鋪炕，把我們接到他家去住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第二天，刘仁柱一早又来逼債，但是哪里有錢还債呢？没办法，我又被逼着上船出海，給他捕魚去了。

五

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到刘仁柱船上扛活的第二年，这年我二十五岁，日本鬼子垮台了，共产党来了，我們一家人和全島漁民一样，得到了解放。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們斗倒了漁霸，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五〇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現在，我家里有八口人，爸爸前几年死了。我媽媽被选为旅大市拥軍优屬模范，我大女儿是紡绳厂工人，島上的民兵排长，两个孩子正在念书，其他人也都有工作。我被評为旅大市的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的劳动模范。我决不辜負党的教导和培养，牢記阶级苦，不断前进，永远革命，把我的后半生献給党，献給我們党的偉大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見了青天

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
自治縣東吐莫公社社員 何金山 口述

文群藝 整理

在過去那個人吃人的舊社會里，我們蒙古族的勞動人民，真是受盡了壓迫和剝削。尤其是我們當奴隸的，在奴隸主的殘暴統治下，更是苦不堪言。

就我知道，我們家三輩子都是奴隸，以前還當了幾輩子奴隸，就不知道了。我不姓何，也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在舊社會，蒙族的奴隸向來都隨奴隸主姓。我們家原來是王爺府的奴隸，在我爺爺那輩，何升阿當了督統（舊社會的官銜），王爺就把我們幾家奴隸當作禮品送給了何升阿，從此我們就改姓何了。從王爺府到何家，奴隸的姓改了，但苦難還象大山一樣壓着我們，沒有改樣。

我爺爺受了多少罪，我不知道。我爹、我娘和我受的罪，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苦難的童年

聽我爹說，我剛生下來，奴隸主的管事就把我的名字登上

了奴隶花名册。在旧社会，奴隶是代代相傳的呀！

我七岁，便被叫到何家燒水、倒茶了。在何家燒水、倒茶太不容易了，光那套規矩就够折磨人的。平常不准出大院，叫到名字得立刻高声答应“扎”；答話时得低头跪下；客人来了，都得跪着接待；端茶盘，献茶，接茶碗，走路，也有規矩。这些規矩都是王法，違犯了一点，就得挨一頓暴打。特別殘暴的是奴隶挨打的时候那一套規矩：說打就得馬上趴下，不許动，不許回嘴，不許喊，也不許哭，越哭越打，直到打死扔出去拉倒。有一回，何督統抽足了大烟要茶喝。也真湊巧，每天水壶开的嘩嘩的，这天柴禾湿水沒开。我吓得跪在門口，低着头小声地說：“柴禾湿，水沒……”这句话还没有說完，老爷的皮鞭就劈头盖臉地打下来了。打得我两眼直冒金花，臉上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我不敢哭，不敢动，咬着嘴唇，忍着刀割似的疼痛。直到晚上回到家里，我才扑在娘的怀里哭了一场。我哭，娘也哭。我求娘别让我再到何家去干活了。我娘很懂得我的心情，但又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含着泪劝我：“咱們是奴才，奴才就是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娘忍着悲痛，把我送进了何家人門。

我九岁那年，何升阿的女儿出嫁，嫁给金哲布，何升阿拿我当陪礼，送到金哲布家当小支使。当时我想，换个地方可能好一点。但事情不象我想的那样。到了金哲布家，生活没有一点改变，照样是燒水、倒茶，照样是挨罵挨打。当何升阿的女儿有了小孩之后，我的日子就更难熬了。白天忙了



一天，已經够累的了，晚上还要給她看孩子。孩子睡在搖籃里，要我一刻不停地搖着。有时，我困极了，扶着搖籃就睡着了。常常是孩子一哭，何督統女儿的巴掌就早落在我的臉上了。每次挨打，我都是把泪水往肚子里咽，当奴隶的連哭的自由都沒有啊！

有一天，金哲布家来了客人。客人喝茶、抽烟，我跪倒爬起的侍候。客人走后，我在地上拣了一个烟头，不巧被金哲布看見了。这个沒有一点人性的家伙，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膊，两只贼眼狠狠地瞪着我，然后拿来两支香烟，塞进我的鼻子里，把我的嘴捂住，把烟点着了。金哲布一家人哈哈大笑，金哲布说：“奴才还想抽烟，臭美！”这时，我感到嗓子里一阵刺痛，我呛着、咳着，红鲜鲜的血都呛出来了。残暴的金哲布，还用木板打我，用香头烧我的鼻子，我被折磨得昏迷过去了。等我苏醒过来，金哲布一家人已经不在客厅了。我忍着火燎一样的疼痛支撑到天黑，趁他们不注意，逃回家里。娘看我被烧成这个样子，就一个劲儿地哭，可是她不敢让我在家里住一宿，她怕我第二天回去受更多的苦。她替我擦完脸上的血迹，就连夜送我回金哲布家。

逼走了爸爸

从我记事起，我爹成天总是闷闷不乐的。我每次挨了打回来，流着血、带着伤回来，我爹都是闷声不响。我后来才知道，我爹看见我那么小就受罪，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疼我，可他自己的遭遇也很悲惨。有一回，何督统家来了客人，何督统喝醉了。我爹跟往常一样地收拾碗筷。何督统看见我爹拿着酒碗，便一口咬定我爹是在偷酒喝。我爹怎么敢在奴隶主面前偷酒喝呀！可是我爹不能分辩。何督统擦着了火柴，把碗里的酒点着了，然后把燃烧着的酒，泼在我爹的脸上和头上。一霎时，我爹的头上、脸上都着火了。按照何家的规矩，我爹不能动，不能喊，只能让火烧着。不大工夫，我爹的头发烧没了，肉皮烧黑了，眼睛烧坏了，整个脑袋没

有一处好地方了。当其他奴隶把我爹扶回家里时，把我娘都吓傻了。这么重的伤，可怎么治啊？当奴隶的，沒有一分錢，按照奴隶主定的規矩，奴隶是不許請医生看病的。沒有別的办法，我娘只好用咸盐水替我爹洗伤口，她一边洗一边哭。我爹的燒伤還沒好，何督統的狗腿子就来催逼他去干活。我爹气极了，实在沒法忍受了，他要去找何督統拚命。我娘知道，这样做会惹出大乱子，就百般劝說：“你去拚命，他們会打死你的……”在我娘的哀求下，我爹只好忍气吞声去干活了。有一天，有一位叫戈完道尔基的穷朋友来找我爹，要我爹偷偷把何督統的牛借給他拉点柴禾。我爹知道，戈完道尔基再不拉点柴禾，就沒法燒火了，而何督統的牛那么多，未必会被发现。我爹大着胆，把牛借給了戈完道尔基。哪知就那么巧，借牛的事儿很快被何督統知道了。我爹被綁在大院的木柱上，何督統喊叫着：“你要造反！”四五个狗腿子，用棍棒輪流打我爹。我爹两眼死死地瞪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奴隶主，沒吭一声。殘暴成性的何督統，見我爹在乱棒之下一声不响，更气了。他叫狗腿子把我爹从木柱上解下来，用杠子压我爹的腿。杠子把腿上的皮肉都压烂了，我爹还是一声不吱。直到我爹昏过去了，何督統才叫罢手。我爹被抬回家里，我娘見了哭得死去活来。我爹在家养了半个多月，伤漸漸地見好了。一天，我爹跟娘說：“我得逃走，你在家好好帶孩子，我混好了，来接你們。”我娘再三劝阻也沒留住。在漆黑的夜里，我爹騎了何家一匹好馬，逃走了。

我爹逃走以后，何督統就要我娘說出我爹逃到哪里去了。我娘說不知道，何督統就叫狗腿子打我娘。何督統追問不出我爹的去向，就對我娘說：“早晚都整死你們！”我娘帶着傷，照旧每天到何家去干活，擠奶、喂豬、喂狗，還要推碾子拉磨。繁重的劳动，再加上惦念我爹，我娘被折磨得只剩皮包骨了。

走爸爸的路

我十三岁那年，何督統把我六岁的弟弟送到金哲布家燒水、倒茶，把我換回來放羊。开始，我很高兴，天真地想，这回可好了，在草甸子上放羊，总比在他們眼皮底下燒水、倒茶要好过一点。可是，实际上并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在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我在甸子上放羊，碰上何督統打圍回来，有一只猎狗沒有抓住狐狸，却闖进羊群把一只羊咬伤了。这能怪我嗎？在老爷面前，我怎么敢去赶那只猎狗呢？可是晚上回来，何督統就派人來叫我了。我一進門，剛跪下，何督統就破口大罵：“你这个廢物！你这个野种！”站在一边的狗腿子就把我捺倒在特制的刑具上，我趴在上面动也动不了。何督統抽足了大烟，就挽起袖子，拿起专打奴隶用的木棒，照我劈头盖脑地打了起来。他打累了，又叫狗腿子打，不知打了多长时间，我昏迷了。等我苏醒过来，才发现已經躺在家里的土炕上了。我想說話，可嘴張不开；想翻个身，可两条腿已經麻木得不能动弹。我娘哭着，用盐水給

我輕輕地擦洗傷口。過了一個月，全身的腫才慢慢消了，才能扶着牆走幾步。我尋思，呆下去也是沒個好，還不如走我爹那條路——逃走。於是，就對娘說：“我在外邊鬧好了，再來看你……”我說不下去了，眼淚象泉水一樣往下流；我娘也哭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是為了活命，除了逃走這條路之外，還有哪條路可走呢！在一個漆黑的夜里，我冒着被抓住殺頭的危險逃走了。

我逃走的第二天，何督統把我娘捆在馬槽上，一邊打一邊罵，要我娘說出我的去路。我娘的衣服都被打成條條了，昏過去好幾次，但她沒有說。何督統並沒有就此罷休，他讓狗腿子逼着我娘干重活，不是推碾就是拉磨。僅僅幾年的工夫，就把我娘折磨得不象人樣了。何督統見她已經喪失勞動能力，就把她趕了出來。從此，我娘就靠討飯度日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

跳出了這個火坑，又掉進了另一個火坑。我逃到齊齊哈爾市附近的甫通司（翻譯官）的馬營子，牧主不知道我是奴隸，留我在那兒干活。我一心想找我爹，在那兒干了四年之後，又跑到扎薩吐旗。在道得寶貴族的馬營子里，終於找到了我爹。一見面，我就抱着我爹哭，我把家裡的遭遇告訴我爹。我爹只是掉眼淚，一句話都不說。原來我爹逃到扎薩吐旗以後，道得寶不知道他是逃出來的奴隸，就留他放馬。我

爹說，道得宝也是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大坏蛋，和何督統一样殘暴。可是我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留在馬營子里替他們干活。

第二年秋天，有一天，我爹騎着馬到总管家去。一百里路当天就可以回来，可是到天黑我爹也沒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我爹还是沒有回来。我急得到处打听，可誰也不知道。到了第四天，不幸的消息终于傳来了：我爹被打死了！当时，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听人說，道得宝知道我爹是个逃跑的奴隶，就把我爹找去，用棒子活活地打死了。爹一死，我也不能再在这个馬營子里呆下去了。我連我爹的尸首都沒有看着，就又逃跑了。

逃出了馬營子，我就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甸子上乱走，越走越累，越走越餓。走了三天，才来到进阳鎮。当时我已經精疲力尽了。我去討飯吃，不巧碰見了一个姓刘的大地主，他要我拿出“国民手帳”（伪滿时老百姓的身份证）来看看。我哪来那个玩意儿，他說我是“黑人”，連說帶吓，要我留在他家干活。我寻思，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就留下干吧。在地主家扛活，虽然沒有何督統家的那套規矩，但是受的苦还是一样的。在进阳鎮，我先后給五六家地主扛活，一气干了十八年。后来听說要抓我当劳工，我又逃跑了。

見 了 青 天

在外面混了二十多年，不知我娘是死是活，我决心回去

看看。一連走了十六七天，在一天半夜里回到了家。我在門外輕輕地喊：“娘，娘，我回来了！”在昏暗的燈光下，看見我那衰老的娘，娘的腿也被打瘸了。她一見我，就哇的一聲哭了，我們娘倆抱頭大哭了一宿。

我娘說，何升阿已經死了，何家已經衰敗了。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地主王牌長來了，他要我出一筆錢買戶口。我說沒有錢，他不答應，他說不交錢就不給落戶口。在逼得我走投無路的時候，解放的大炮響了，共產黨來了，我得到了解放，蒙族人民都得到了解放。我們這些奴隸，真正見了青天。

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土地、牛、馬、羊和房屋。以後，我們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我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解放後，我娶了個老伴，生下個胖丫頭。一家人有吃有穿，真使我高興極了。由於過去受奴隸主的折磨，我身體不太好，生產隊照顧我，給我輕活兒，晚上為羊群打更。現在是給咱們自己干活，我越干越有勁，也不知道啥叫累，大家評我為五好社員。公社和生產隊的幹部，常到我家問長問短，可關心我啦。我常跟我家里人說，現在的生活比蜜還甜！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太深了，真是報答不盡呀！我要教育我的孩子，永遠跟着共產黨，永遠跟着毛主席！

附录：

惡霸地主徐万增的罪行录

中共吉林省双辽县委宣传部 整理

徐万增是吉林省双辽县望杏村的惡霸地主。望杏村，位于吉林省双辽县永家公社的中部，这里沙丘环绕，绿树成荫，良田广阔，草原无垠，是一个风景幽美，适于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

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里，这个美丽的村落却是一座人间地狱。几十年来，惡霸地主徐万增盘踞在这里，横行霸道，欺压人民，无恶不作。

巧买“王荒”，霸占土地

六十年前，望杏村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是清朝蒙古族贵族温都尔亲王的封地。宣统年间，温都尔为了扩大自己的霸业，招骗穷苦农民给他开发草原，规定三年不收地稅。因此，一些逃荒的穷苦农民，就拖儿带女，到这里来开荒度日。

农民们成年累月地劳动着，烈日晒红了脊梁，汗水一滴

滴滴在地上。他們斬断了野草和荆棘，挖掉了丛生的灌木，一鎬一鎬地把大片荒地开发起来，种上了庄稼，搭起了窝棚，建起了村落。那时候，村南的沙丘上长满了野杏树，人們能看見杏花，聞到花香，于是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望杏村。农民們希望能在这里过安静的日子，但是，在旧社会里，那是办不到的。民国初年，地主徐天錫看中了这块地方，就象恶狼扑食似地来到了望杏村。

徐天錫是河北省临榆人，給溫都尔亲王当过差，专门为王府征收地稅，借机向农民进行敲詐勒索。当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沾着农民血汗的大洋以后，便辞了差事，带着老婆和儿子来到这个新开发的小村落。他廉价地买了五方（二千二百五十亩）好地，在村北修起了大院套。这座院套北依山崗，南望平川，人們就叫它“靠山徐家”。

徐天錫死后，他的儿子徐万增为了迅速扩大徐家的霸业，就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占有的土地。夺地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大口吞”，一是“金鈎鈎”。所謂“大口吞”，就是大量收买“王荒”。徐家父子看見当时望杏村农民开发起来的熟荒，土质肥，打粮多，便流出了貪婪的涎水，曾几次带着厚礼和大洋，到他从前主子——溫都尔亲王那里去“买荒”，将望杏村农民开发起来一两年的熟荒，一块又一块地据为己有。所謂“金鈎鈎”，就是对村中有少許土地的农民施以小恩小惠，主动抬粮、借錢，等他們无力偿还时，就逼迫农民以地頂債。安仁里屯的潘貴家有五垧地，和靠山徐家

的地紧挨着，被徐万增看到眼里，他便对潘贵说：“咱们前后屯住着，地挨地，你缺啥只管说话。”潘贵只当他是好心，就抬了徐家的粮，不到几年的工夫这笔账就多了。徐万增皮笑肉不笑地对潘贵说：“咱们的账该算一算了！”潘贵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忍痛将五垧地给徐家顶了账。多年来，徐家父子就利用巧买“王荒”，“金钩钓鱼”，巧取豪夺的手段，占去望杏村的九千多亩土地，成了双辽县东部地区的头号大地主。

高租重利，盘剥农民

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后，徐万增对穷人更加凶狠残暴。他继承了徐天锡的发家宝：“招青、雇工、放高利贷”，更加残酷地对穷苦人民进行剥削。因此，人们称他“徐四閻王”，也叫他“四转转”，意思是说脑子里的坏点子多，一转转就没有好道。徐万增是徐家的大当家的，总揽徐家大权。为了加紧对穷人的剥削，他们哥八个都有专职分工：

“大美人”徐万春专门串通官府衙门，“二缺德”徐万胜管园田，“三小店”徐万箱管畜牧，“五閻王”徐万福“查边”，“六撓子”徐万和管钱财账目，“七红眼”徐万德和“小八万”徐万青也是“查边”的。

靠山徐家的土地，大部分依靠租地户和楞青户种。徐万增对佃户和青户都采取“三七”、“四六”和对半分的办法收租和劈成。每年秋收时，徐万增和徐家的贼子贼孙，便领

着亲信的狗腿子們，到青戶家和外地的窩堡催租逼債，監督打場，過斗，哪怕是一斗土糧，也要在他們的監督下称一称。遇上歉收和灾年，佃戶和青戶都要照例繳租納糧。佃戶和青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青黃不接和遇上灾年的时候，就不得不向徐家抬糧、借錢。因此，年年負債，无力自拔。

租地戶姜海山給徐家种了三年地，就被抄家了。第一年，因为租子太重，收成不好，繳了租子，就沒有吃糧了。沒辦法，只好向徐万增抬糧。到了第二年，被徐家东扣西扣，不但又白干一年，反落得旧債未还又添新債。徐万增到姜家来逼債，沒好气地說：“姜海山，你欠的債还想不想还了？再不还可別說我不讲情面了！”姜海山陪笑地說：“四当家的，行个方便，緩一年再还吧！”徐万增眉头一皺計上心来。他知道姜海山有三头牲口和一辆車，可以抵債，便說：“哼！緩一年，你能还上嗎？咱們丑話說在前头，过年你砸鍋卖铁也得还！”第三年上秋，打糧又不多。徐万增便領着四、五个狗腿子来到姜家。一进屋，徐万增就恶狠狠地說：“姜海山，这回該还債了吧？”姜海山颤抖地說：“四当家的，今年的年头你是知道的……”沒等把話說完，徐万增就罵起来：“他媽的，你想白种我的地呀？告訴你有錢还錢，沒錢还物。”狗腿子們就把姜海山那三个牲口从馬棚里拉出来，套在車上，并到屋里把破东烂西搜个溜干二淨，放到車上拉跑了。姜海山拽住徐万增苦苦哀求，徐万增

甩开他，“别他媽再囉嗦！从明天起你滾出我这个屯！”姜海山无奈，只好含泪逃荒到外地去了。象这样“傾家还債”，流落他乡的人，又何止姜海山一家呢！

放高利貸，是靠山徐家剝削穷苦农民的另一种手段。徐万增說：“抬粮放債是发家宝。”望奎村的穷苦农民說：“高利貸是农民脖子上的一把刀。”这話一点也不假。徐万增放債少則年利八分，多則大加一。春借秋还，十个月为期，过期不还，将利做本。抬粮，一般是五分利，过期不还也是利上加利。徐万增抬粮放債还有几个条件：沒房地的人家不借，沒有車馬的人家不借，沒劳动力的不借。赵青林借了徐万增五百元錢，五分利，过了三年，就滾到了一千六、七百元。赵青林一看沒有办法，只好让他的哥哥和弟弟也来給徐家扛活。哥三个为了还这笔高利貸，不往家拿一个錢，一升米，孩子老婆只得求亲靠友掙扎度日。他們一共扛了三十多年大活，光赵青林自己整整扛了十五年！十五年来，他起早貪黑，风里雨里，苦熬苦煎，累断了筋骨，好歹才算把这笔錢还上。当他拖着衰弱的身子离开靠山徐家时，悲憤交加地朝着徐家大門說：“我可算逃出了这座鬼門关！”但徐家的多年摧殘，使他积劳成疾，不久就死去了。

专橫凶殘，迫害长工

靠山徐家除了招青，还雇工种了好几千亩土地。每年雇大活和短工不下一百余人。徐家的人对这些伙計更加专橫凶

殘。当时，給徐家扛活的都說：“丁香苦，黃連苦，最苦沒有扛活的苦。”扛活的一年从正月十五上工到腊月十五下工的十一个月中，仅放三天工，無論冬夏都是披星戴月，風里雨里拚命地干活。就这样，“四閻王”徐万增还罵：“穷人是賤骨头，不收拾就不好好干。”他派“七紅眼”徐万德每天在扛活的下地后，把大門关上，背着枪在院子里巡邏，不論是刮風、下雨，不到天黑不准扛活的回来，又派“五閻王”和“小八万”輪流到地里“查边”，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在夏天，“小八万”到地里“查边”，背着匣枪，身穿串綢布衫，一手打着漂亮的伞，一手拿着双头馬鞭，跟在扛活的后面。扛活的稍有怠慢，举鞭就打，抬脚就踢。因此，扛活的說：“要吃徐家飯，就得拿命換！”

徐家雇大活有个規定：“刀镰斧伤，自由天命，誤工不做，閑忙工随行就市，偷摸滲漏，由保人負責。”扛活的进了徐家門，就变成了无代价的劳动力，任他們驅使。刘老二原讲給徐家扛一年活，工錢七十五元。后来干四个月累的实在受不了，想退工，徐万增又不答应，最后只得又花四石粮給雇四个秋月。結果还差三个月工到年底，“随行就市”一算，还得給徐万增找回四十六元錢。洪源屯的陈万山，給一个扛活的当保，后来这个扛活的干了半年，因为不堪忍受徐家的压榨而逃走，徐万增就硬逼着陈万山給扛了半年活。到秋算賬，还欠徐家錢，因沒錢給，徐万增竟将陈万山身上穿的老羊皮袄剥去。

在靠山徐家这座人間地獄里，不知有多少长工累折了筋骨，断送了生命。打更的老陈头，被徐家折磨的一身是病，瘦的三条筋挑着头，还得支撑着給徐家干活。一天，徐万增硬逼他扛三斗苞米到碾道去压料，他咬牙把口袋扛起来，沒走几步，就跌倒在地上，大口地咳血。徐万增看見后，狠狠地踢了两脚。老陈头从这天起躺在更房子里，再也起不来了。偏巧，又赶上徐家的祖坟被徐家大烟鬼徐兆丰盜了，将垫在尸体下的元宝拿去換了大烟。徐万增硬賴老陈头装病，夜間勾結坏人，盜了他家的祖坟。将老陈头狠狠地打了一頓，并限三天之内交出盜坟的人，否則，就将他送到警察署枪毙。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被逼得无路可走，就在晚上投井自杀了。

当时，长工中間流傳这样一首歌謠：“徐家就是鬼門关，进去容易出来难。”扛活的有一点不对徐家的心眼儿，就要被送进官府治罪或抓去当劳工。猪倌刘恩富下雨天披徐家一条麻袋回家，被徐万增看見，硬說他偷了麻袋，竟将他送到法院押了五天。扛活的張連江，給靠山徐家扛七、八年大活，有时，因为有病誤了几个工，可是到秋后“隨行就市”一算，年年拿不回家一个錢，还得給徐家补工。因此，他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掙点現錢換口粮，不得不以有病作托詞偷着出去打短工。这事被徐万增知道后，便罵：“真他媽的反了，扛活的要跳槽，把他給我抓去当劳工，让他尝尝厉害！”事隔不久，即派他侄子、村雇員徐兆文領着几个狗腿子去抓張連江当劳工。这时，張連江正有病躺在炕上，他老

婆剛剛生孩子十四天，这伙恶棍沒容分說，就闖进屋去，將張連江从炕上拽下来，綁上就往外推。張連江的老婆掙扎起来苦苦哀求，竟被狗腿子推倒在地上。張連江的老婆領着几个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出来，拼命追赶，放声大哭。这群匪徒却看也不看一眼。張連江被抓去送到西安（辽源）煤矿当劳工，因矿坑坍塌受了重伤。有一天大雨傾盆，工头就把他拽到工棚外边，被暴雨拍死了。他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她只好領着三个孩子，沿村乞討，过着顛沛流离的生活。

仗勢欺人，荒淫无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恶霸地主靠山徐家，认贼作父，立即投靠日本鬼子和汉奸警察，勾結貪官污吏和土匪强盜，欺压望杏村的老百姓。

徐万增用大量金錢賄賂，使他六弟徐万和当上了村长（当时的村，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区），他二哥徐万胜当上了大团团长。徐家少輩賊子賊孙中有不少也都混上了官事。有当村雇員、助理員和警尉补的，还有在县公署当股长的，“大美人”徐万春的大姑爷王庆德，是伪空軍少校軍需官。因此官府衙門对靠山徐家都是另眼看待，恭而敬之，来来往往，密切非常。

靠山徐家不但交了官府，而且还勾結土匪强盜，坐地分贓。“天下好”綉子匪首王永清，是“三小店”的干老丈

人，經常和徐家來往。徐萬增本人曾多次給王永清銷過贓馬，從中得到不少好處。

徐家有錢有勢，上交官府，下結匪盜，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在望杏村一手遮天。“六撓子”借當村長的職權，把勞工和苛捐雜稅全加在窮人頭上，對窮人進行敲詐勒索；“二缺德”借當大團團長的職權，打罵群眾，橫行霸道；“四閻王”徐萬增還規定：窮人不能到徐家房後的崗子上打柴禾，更不能到徐家地裡去揀糧。如被發現，輕則訓斥打罵，重則罰款罰糧。錦秋里屯的周老太太，到靠山徐家門前要飯，“四閻王”罵道：“你們這些劣光蛋肚子都綠了，鴨子見了擡四十里。趕快給我滾，別他媽沾了我的地！”他的兒子還領一群獵狗威吓說：“再不走，放狗咬死你這個老東西！”吓的周老太太一口氣跑出了靠山徐家。貧農顏三媳婦到徐家地裡揀糧，被“二缺德”的孫子徐志學看見了，二話沒說，就是一頓拳打腳踢。顏三媳婦當場就被踢流產，昏了過去。還有一年，一個過路人拿四穗苞米從徐家房西過，被“二缺德”看見，硬說是在徐家地裡掰的，過路人說不是，“二缺德”就舉起馬鞭子劈頭蓋臉地狠打，並罵道：“你他媽敢賴？這兒全是我們老徐家的地，再賴我剝了你的皮！”最後硬逼着過路人把四穗苞米生啃着吃了。

惡霸地主徐萬增在窮人的眼淚、鮮血和白骨中創立了家業。徐家每年收糧萬石，堆積如山。在青黃不接糧價上漲的時候，成火車運往四平等地去銷售。換回成口袋的大洋和紙

币，供他們抽大烟、逛窑娼、吃喝玩乐、揮霍享受。徐家有小打、厨師二十多人。徐万增出門前护后拥，跟着一大群打手。徐家哥八个成天圍着圓桌面，喝酒划拳。扛活的管这叫“王八圍”。他們不但活着时吃喝玩乐，揮金如土，在死的时候，还要大肆揮霍。“大美人”死时，大举丧礼：高搭灵棚，两班鼓乐，一棚老道經，二十四名厨師，有錢的送来猪羊祭，穷人在吃不上飯的情况下，还要被迫給他們送饅头作祭礼。这场丧礼共花伪币三千多元。相当于五十个扛活的一年的工錢，折粮三百五十多石，可供全村穷苦农民吃一年半。

伺机翻把，倒算行凶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伪“滿洲国”倒台了。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徐万增看見他的靠山沒有了，感到大勢已去。但是，他觉得保住财产就好办事。于是，在他的指揮下，徐家的賊子賊孙开始分头活动。有的外出探听消息，注意局势的变化；有的在家疏散財物，把大洋、金銀手飾等值錢的东西埋起来；还有的去勾結土匪，企图維護地主阶级的反动統治。

不久，在距望杏村二十里的双山鎮，来了八路军一四七团，枪毙了刘大馬棒等人民恨之人骨的汉奸警察，成立了双山县人民政府。接着，又在安边堡成立了区政府。望杏村也

来了工作组。在工作组的帮助下组织了农民会，常常把过去的青户和扛活的找到一起开会。这一切徐万增都看在眼里，他摇摇头大失所望地说：“看样子这回世道是真变了！”老奸巨滑的徐万增不得不收敛一下地主阶级的狰狞面目，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来应付人民政府和望杏村的老百姓。对人民政府摊派的钱粮、物资，他总是说：“这好说，这好说……”表示认真缴纳，似乎他是一个“忠诚的顺民”。其实，他的心里并不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坐待时机，望风而行”。他不断地在暗地里探听局势的变化，勾结土匪，买枪买马，准备一有机会就和八路军干一场。

一九四六年，卖国贼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使下，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妄想建立“二满洲”。

同年初夏，我八路军双山地区驻军奉命向北进行战略性撤退。这时，一直盼望变天的徐万增认为时机已到，立刻摘下了假面具，露出了吃人的嘴脸。他把徐家的贼子贼孙和亲信的狗腿子以及土匪等乌合之众，武装起来。徐家有长、短枪五、六十支，轻机枪一挺，和大量的手榴弹及子弹。徐万增还让他的孙子徐志学到卧虎屯勾结国民党匪军，准备来望杏村和他们一起截击向北转移的八路军。他亲自指挥徐家匪徒，弓上弦，刀出鞘，成天守在炮楼子上，窥视我军行动情况。

我軍全部北移之后，国民党匪軍盘踞了双山地区。徐万增依靠国民党的势力，組織“地主还乡团”。他是总指揮，匪首“周大洋馬”，狗腿子田玉山是副总指揮。并带着他侄徐“二犢子”（徐兆民）、徐家姑爷王澤生等和几十名土匪、清剿队回到了望杏村。徐万增一回望杏村，就到处抓人。他騎在馬上恶狠狠地說：“我要让这些穷光蛋知道我的厉害！”

經狗腿子袁三告密，徐万增先到錦秋里抓住了我农会主任国昌和，用皮鞭蘸凉水抽打。他打累了，就让狗腿子打。把国昌和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綻。但是，国昌和始終沒有屈服。他只用一句話来回答徐万增：“你們等着吧，总有一天八路军会回来的！”

殘害了国昌和之后，徐万增又带匪徒，到安仁里把在我区政府当过保安队员的侯振邦抓住。他們把侯振邦的两只胳膊拉直，用大扁担綁上，交给狗腿子进行拷打。“四閻王”便和徐兆民等到侯振邦家去抄家。徐家的打手們将屋內的盆盆罐罐砸得粉碎，破东烂西搶劫一空。灭絕人性的徐万增，还将侯振邦的媽媽捺到鍋腔上，用灶火燒焦了老人的头发和皮肉。最后，他們竟然把热灰揉进了侯振邦的眼睛，老侯的一只眼睛，就这样被燙瞎了，另一只眼睛也落下了殘疾。

徐万增在安仁里行凶之后，又杀害了我安边区区政府文书張紹武同志，并害死了張紹武同志的妻子、弟弟和儿子。

徐万增，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在罪恶滔天的倒算

中，毒刑拷打我区干部、区中队队员、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百余人，杀害了三十一人。又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

人民当家，恶霸伏法

一九四七年，我军进行了全面大反攻，国民党匪军象秋风扫落叶似地节节败退。三月，我军解放了双山镇。

徐万增看见他的第二个靠山——国民党，又倒台子了，情知大势已去，人民政府对他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不会宽恕的。因此，他指挥徐家子孙，带上金银财宝、细软物资，畏罪潜逃，以待他日东山再起。徐家的走狗帮凶也随着地主势力的崩溃，抱头鼠窜了。

徐万增逃到了梨树县一棵树，埋名隐姓，伪称贫农张木匠。徐万和也逃到梨树隐居。徐二聋子逃到了四平，更名改姓，潜伏于人海之中。徐二聋子的儿子徐志学竟改名孙大有，混入我军当了文书。这些靠山徐家的元凶祸首就这样暂时地隐藏起来，企图混过关去。

但是，望杏村的人民并没有忘记恶霸地主徐万增欠下的血债，复仇的火焰在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尽管地主再狡猾，终究蒙蔽不了人民的眼睛，更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在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揭发检举下，终于在一九五〇年逮捕了靠山徐家的元凶“四阎王”徐万增。伪村长徐万和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在榆树台附近畏罪自杀了。接着逃窜在外的“二聋子”徐兆民和狗腿子“大洋马”周凤岐、田玉山、王泽生等也先后

落网，就连更名改姓混入我军的徐志学也被清查出来，逮捕归案了。

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政府首先处决了恶霸地主徐万增。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政府在望杏村召开了公审大会，公审恶霸地主徐万德、徐兆民和“周大洋马”、田玉山、王泽生等匪首。三千多名群众怀着复仇的怒火，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会上，有二十多位受害者的家属，作了血泪的控诉，要求人民政府为人民伸冤报仇。最后，双辽县人民政府判处了恶霸地主徐万德、徐兆民和走狗周凤岐、田玉山、王泽生等死刑。

从此，望杏村的人民伸了冤，报了仇。他们挺起了腰板子，以主人翁的姿态，在自己的土地上奋发地劳动着。

漁霸蔡仁欽的罪行录

辽宁省长海县獐子人民公社 整理

一、獐子島上的海霸王

在黃海的北部，長山列島的南端，有個美麗的小島，名叫獐子島。據說，很早以前，這裡山上樹林密布，獐子遍野，海里的漁產也十分豐富，所以有“棍打獐子，瓢舀魚”的傳說。

但是，在舊社會，這個有幾百戶人家的小海島，卻被幾個毒蛇般的漁霸殘酷地統治着，漁民們終年冒着大風大浪在海上勞動，却过着暗無天日、飢寒交迫的生活。

當時，島上流傳着這樣一首民謠：“獐子島，獐子島，窮的多，富的少，漁民賣命在海上，終年肚里吃不飽。”這就是當時島上漁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

蔡仁欽是獐子島的漁霸之一。在那時候，島上的漁民當面都不敢叫他的名字，只能稱呼“蔡爺”、“蔡會長”。凡是他的“主顧”，就得叫他“供主”、“東家”、“蔡掌

柜”。天长日久，很多漁民就不再知道蔡仁欽的名字了。可是人們心里却恨透了这个吸血鬼，因为他长了一臉麻子，所以在背地里，漁民們都叫他“蔡大麻子”。

要想知道蔡大麻子的底細，就得从他的父亲說起。

蔡大麻子的父亲，名叫蔡为貴，原来住在裕連島上，是个見錢眼开、有利就钻、連做梦也想发财的商人。他觉得裕連島地方小人少，不如獐子島地方大人多，便在一八九七年搬到了獐子島沙包子屯，勾結两个小商人，开了个“三合店”杂货鋪。

蔡为貴有五个儿子，蔡大麻子是他的大儿子。一九〇二年，蔡为貴死后，蔡大麻子就接过他父亲的遗产，当上了“三合店”的老板。第二年，他勾引山东烟台的商人入股扩店，将“三合店”改为“义順永”漁行，开始专门购銷海产品和漁业用具，放高利貸，以后又出租漁船，对漁民进行着殘酷的剝削和压榨。

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蔡大麻子认賊作父，当了汉奸，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一九一六年当上了獐子島会务所的伪会长（即島上的行政头目）。一九四二年，蔡大麻子的儿子蔡树仁，外号叫“小煞槓子”，又当上了伪会副会长兼漁业組合副組合长（組合长是日本鬼子）。蔡大麻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掌握了島上的政治、經濟大权，为所欲为，殘酷地压迫和剝削漁民。

一九〇三年，蔡大麻子开設的“义順永”漁行，仅有三

間店面，資本也不多。以后，他用剝削来的錢，逐年扩大买卖，到一九四二年，就有了店房三十六間，大小漁船六十多只，一座大粮仓，七、八个狗腿子，三十多个伙計。他的“实供”戶有四十多戶，“拾錢”戶有三十多戶。此外，在皮口有房产八十余間，土地百余亩。蔡大麻子成了獐子島的头号霸主。

蔡大麻子为什么能有这么多錢財呢？他常对人說：“我蔡仁欽的祖坟风水好、福气大。我的錢是靠我的‘买卖’一个一个賺来的。”

事实真是这样嗎？讓我們剝开他的皮来，看看他的“买卖”的真象吧！

二、“义順永”漁行的真面目

漁民說：“蔡大麻子的买卖，是紅胡子买卖，不讲理。”这是一言道破了蔡大麻子剝削漁民的秘密。

蔡大麻子对漁民的剝削是无孔不入的，剝削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放高利貸：远在一九〇三年，“义順永”漁行剛开办时，浙江省宁波等地的南方商船，来獐子島各家漁行购买魚干。当时，向漁行买一船魚干，必須在前一年預交定銀一百两，第二年取貨。蔡大麻子一看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就对南方来的商人大献殷勤，騙得了他們的信任，漁商們都紛紛来委托他代购魚干。蔡大麻子担任伪会长后，南方来的商

船，就大部分被他控制。所以，他每年得到的定銀，比島上哪一家漁行都多。蔡大麻子得到錢后，就向漁民大放高利貸，殘酷地剝削漁民。

蔡大麻子放高利貸，其利息一般是二分或二分五；对有勞力而又非借不可的，一年甚至要兩節利（八月節、春節各計一次），一般是春節三分，八月節二分。

高利貸可真坑人，誰要借了蔡大麻子的高利貸，誰的脖子上，就象套上了根繩子，越勒越緊，結果是子子孫孫也還不清。島上很多貧苦的漁民，就是因为貸了蔡大麻子的款，成了蔡大麻子的“實供”戶，弄得傾家蕩產，被迫当了奴隸。

高價盤剝：蔡大麻子放債，一般不貸給現款（個別富裕戶可以貸到現款），而是貸船隻、漁具、布和苞米等物資。這些物資，利潤高得驚人。

“義順永”經營的物資，都是從大連、皮口買來的，賣（貸）給漁民時，價格一般比市價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有些急需物資，蔡大麻子成倍地抬高價格。“實供”戶，吃穿用都由蔡大麻子供給，價格就更得由他說了算。漁民們明知買蔡大麻子的東西吃虧，可是在那個世道有什麼辦法？到大連、皮口去買吧，都得用現錢。可是窮苦的漁民連吃的都沒有，又哪裡來的現錢。向蔡大麻子去借吧，這個吸血鬼，為了逼着漁民受他的高價盤剝，不借現款。就是有錢有船到島外去買，蔡大麻子依仗偽會長勢力，規定都得到小衙門（會務所）填個許可證，不送厚禮也是辦不成事的。所以窮苦漁

民就只得忍痛接受他的高价盘剥。

低价收购渔产：为了无限制地剥削渔民，蔡大麻子还恶毒地规定，凡是他的“抬钱”户，都得把鱼卖给他的渔行，鱼价由他说了算，一般比市价低百分之二十左右，质量却比市场要求高。另外，还要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不仅这样，卖下的钱，渔民拿不到手，全部扣去抵债。

大秤进小秤出，大斗进小斗出：进货时，用大斗、大秤；出货时，用小斗、小秤。这是蔡大麻子剥削渔民的另一种方法。

他的斗，进粮四十四斤，卖粮时，在斗里加上个木塞，美其名曰加“斗宝”，一斗苞米，就会被这个“斗宝”挤去六斤。他的秤，是出名的“老八十”。渔民交给他的鱼，一百斤只能称八十斤。有时，就是超过一百斤，可是掌秤的猛掀猛压，总也超不过八十斤。往外卖就不同了，正好翻个个儿。

这一点，渔民心中是有数的，可是要卖，还得卖给他，要买，也必须买他的。渔民的冤枉气，只好往肚里咽。

上面讲的，就是蔡大麻子剥削的几种主要方法，也就是他起家的“法宝”。

三、罪恶的“实供”制度

蔡大麻子对渔民进行这样残酷的剥削，渔民们当然是不甘心的。但是，蔡大麻子搞了一套统治和剥削渔民的“实

供”制度，强迫漁民成为他的“实供”戶，使漁民不得不忍受他的統治和剝削。

“实供”制度是不折不扣的奴隶制度

蔡大麻子是怎样强迫漁民成为他的“实供”戶的呢？主要的方法，就是貸船只、网具和生产資料。有很多漁民，家里有劳动力沒有船，如果誰被蔡大麻子看中，他就以請客为名，把誰請去。他装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假惺惺地說：

“你家孩子都长大了，有这么多人，你自己养条船吧！家里的吃穿么，全部到我柜上抬！”他并主动把船給搖来，作价不是一千元，就是八百元。漁民們明知道这是黄鼠狼給鸡拜年沒安好心，但是，貧苦漁民，由于无船无錢，出于生活所迫，加上蔡大麻子的威胁、欺騙和引誘，便被迫成了蔡大麻子的“实供”戶。

漁民一旦成了蔡大麻子的“实供”戶，就被全部剝夺了一切权利。按照蔡大麻子的規定：“实供”戶的生产，統由蔡大麻子指揮，打上来的魚虾，得全部交給他的漁行。交多少斤，作多少价，“实供”戶根本无权过問。

“实供”戶全年的生产和生活費用，也都由蔡大麻子供給。用多少，吃多少，均由蔡大麻子說了算。粮食給一点，吃一点，不給就得餓肚子。吃的用的，都是高价計本，高利息，打入欠債。賬上記多少，“实供”戶也无权过問。

“实供”戶生了孩子，为了給孩子吃的，也只得到蔡大

麻子那里去“报户口”，請求糧食。如果生的是女孩，往往是不給糧食，还得遭到蔡大麻子的臭罵：“臭丫头，賠錢貨！”如果生的是男孩，蔡大麻子就另換一副嘴臉，奸笑地說：“好，又給我多了个干活的，給二升！”

“实供”制度，就象一条鎖鏈，逼得漁民只能忍受他的种种剝削。

“拽 饥 荒”

当“实供”戶欠債过多，蔡大麻子认为没有什么油水可撈，但“实供”戶家里能干活的人，可以被他的无偿剝削时，他就把“实供”戶的船、房子或土地收去頂債，作价多少，由他說了算，剩下的欠債，就逼着能干活的人，到他的船上“拽饥荒”（即以身抵債）。父亲还不完，儿子接着还，儿子还不清，再由孙子还。总之，让子子孙孙接着給他干活还債，这叫“父債子还”。那时候，不知有多少勤劳而貧苦的漁民，在蔡大麻子的“父債子还”的压榨下被吸干了血，也不知有多少漁民被弄得家破人亡。

大約在一九一〇年左右，貧苦漁民石日发的爷爷，被迫向蔡大麻子貸了一只船，作价一千元，結果成了他的“实供”戶。爷四个成年累月拚命地干，不但沒有还上債，加上全家的衣食費用，利滾利，利作本，滾来滾去，到了一九一四年，仅仅三、四年時間，就滾到二千多元。被蔡大麻子把船收回去不算，又把石日发家祖輩留下的几亩地，也都霸去抵

債。但還剩下六元錢債，蔡大麻子就逼着石日发的伯父去給他“拽飢荒”。石日发的爷爷和伯父不甘心再為蔡大麻子賣命，一口氣跑到北大荒。可是，在那萬惡的舊社會里，窮人到哪里也都得受地主老財的壓迫。他們跳出了火坑，又上了刀山，在北大荒，由於飢寒交迫，不久，被活活地餓死在那里了。

石日发的爷爷和伯父走后，狠心腸的蔡大麻子就以“父債子還”的規矩，硬逼着石日发的父亲石长年去“拽飢荒”。石长年去后，家里的吃穿用，就只得到蔡大麻子柜上去要，但這不是給石长年的工錢，而是計本核息，作為欠債。這樣，石长年整整給蔡大麻子干了四年，結果不僅沒有還上六元錢的債，反而連本帶利又滾到了六十元。一九一八年，石长年到安東（現改名丹東）裝豆餅，由於长年勞累，體力虛弱，在背豆餅時，突然頭暈眼花，身子一晃，一片豆餅掉進水里。當時，蔡大麻子的狗腿子在監工，逼着石长年下水去撈。可是，由於飢餓和疲勞，石长年下水后，再也沒有上來。

石长年死后，他的妻子改嫁給徐寶元。蔡大麻子又逼徐寶元去“拽飢荒”。一九一九年，石日发才十一歲，也被蔡大麻子拉去給他放豬，接着，上船“拽飢荒”。石日发的妹妹結婚后，又逼着他的妹夫鄒萬齡去還債。以后，石日发到底欠了多少債，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石日发一家一連干了二十多年，也沒有還清他爷爷欠下的六元錢“閻王債”，直

到解放，共产党来了，才跳出了火坑，见了青天。

渔民李尚安，原来在贩主子(养船户)李学功的船上当渔工，不曾欠蔡大麻子一文钱。但是，蔡大麻子看中了李尚安家的三个劳动力，总想设法弄到手。以后李学功由于生意不好，欠了蔡大麻子的债，到一九三五年，已经欠了几百元。蔡大麻子就趁机没收了李学功的房子，还以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借口，硬转给李尚安一百八十元的债，结果就把李家三个劳动力捞到了手，逼着到他船上“拽饥荒”。当时，刀把子掌握在蔡大麻子手里，衙门是给有钱人开的，穷人有冤又到哪里去诉呢？这一笔无名的冤枉债，就这样落到了李尚安身上。直到解放以前，这笔债也没有还清。

敲 榨 勒 索

蔡大麻子逼“实供”户还“饥荒”的办法，是穷凶极恶的，只要能捞到钱，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

渔民张玉茂是蔡大麻子的“实供”户，开始欠债八百元。到一九二〇年，就滚到一千五百元。当年冬月，因为过年缺吃少钱，他爹就去向蔡大麻子借。结果没有借到，反被蔡大麻子臭骂了一顿：“没有吃的，没有用的，海里有的是，怎么不会自己去钓。你欠下的债已经不少，我哪能供给你那么多……”

他爹一窝火，就领着他哥俩和另外三个渔民冒着严寒出海钓鱼。谁知道，正遇上大风，把船刮翻了，张玉茂和他爹

同另外三人都被淹死了，只有他弟弟在海上遇到輪船得救，才死里逃生，回到了島上。黑心腸的蔡大麻子却嘿嘿冷笑着說：“哈，还回来一个送信的，給我‘拽饥荒’去！”这还不算，狠毒的蔡大麻子又把張玉茂的妻子卖了，得了三百元，全部拿去抵債。

蔡大麻子这个吸血鬼，他不但吸活人的血，就是人死了，也还要在死尸上捞油水。

一九三二年，“实供”戶周傳生家，被蔡大麻子沒收了船和土地，剩下欠債一千元。第二年，他的两个大儿子——周家新、周家茂，就被蔡大麻子逼着去“拽饥荒”，他自己領着小儿子到漁霸石子玉柜上“卖老肩子”（預借工錢，然后以身抵債）。但在漁霸石子玉高利貸盘剝下，几年后，又欠下石子玉二百元的債。有一天，周傳生因病沒有出海，家里又沒有吃的，就到石子玉柜上去抬粮。石子玉却逼着他出海、还債。周傳生哪里来錢还債，一上火，就冲着石子玉說：“你这么逼我，还让不让我活呀？”当年，獐子島是漁霸的天下，石子玉被周傳生頂撞几句，他哪里肯让，二话沒說，就拿起秤杆，把周傳生毒打了一頓，當場把秤杆打成两截。周傳生回家后，就吐血。第二天，家里等着米下鍋，逼得沒法，只得領着儿子出海拉海螺。当天，海上刮着七級大风，爷三个連飯都吃不飽，哪里有力气搖船。搖出去不远，周傳生就暈倒了，沒有办法，兄弟俩只得又把船搖了回来。就在当天晚上，劳累一生的周傳生含冤死去了。

周傳生死后，“义順永”的二掌柜、蔡大麻子的五弟，外号叫蔡五蝎子，把周傳生的妻子傳去，煞似关心地说：“告诉你，你老头是被石子玉打死的。”接着，蔡五蝎子就依仗蔡大麻子担任伪会长的势力，到会所把石子玉告了，敲了石子玉七百元钱的竹杠。钱拿到手后，蔡五蝎子假惺惺给周家三十元，说是“发送”死人用的。其余全部被敲去了。

两种生活

殘无人道的蔡大麻子，就是这样摧殘漁民，使漁民們过着吃不飽、穿不暖、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一般的生活。前面說的石日发一家，爷爷、伯父逃亡，爹在海里淹死，媽媽被迫討飯，要一点，吃一点。吃不飽，穿的就更难了。石日发爷爷活着时，分家分的一件破棉袄，是他家唯一的一件好衣服。这件“棉衣”，老少整整穿了三辈，补釘落补釘，里面的棉花只剩下星星点点了。晚上睡觉沒有褥子，只好用破麻袋片子，絮上点海带草当褥子。石日发沒有衣服穿，他媽只好到山上拣件死孩子衣服，到河沟里洗一洗，补一补，給他穿。周傳生一家，在周傳生死后，就被逼着逃出獐子島。大儿子周家新逃到大连小平島，在那里釣魚，不久就死在那里。二儿子周家茂逃到金县大孤山，先是在日本船上打魚，后来又在大孤山釣魚，以后又被抓劳工，弄得妻离子散。

可是，蔡大麻子却用从漁民那里搜刮来的錢財，大肆揮霍，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蔡大麻子在他五十多

岁时，又娶了个二十多岁的小老婆。他特意为小老婆盖了一座十二间的大瓦房，渔民称它为“乌龙院”（意指乌七八糟的场所），里面客厅、卧室、赌场、餐厅无所不有。小老婆天天抽大烟、扎吗啡，吃的穿的就更不用提了。在小老婆病的时候，蔡大麻子听“大神”说：房子盖的不是地方，风水不好，若不拆掉，不仅小老婆的命保不住，就连他家的日子也难久长。蔡大麻子一听，就赶紧把这座大瓦房拆掉，又请了“风水先生”，另选地盘，重盖了一座。可是结果并没有保住小老婆的命。小老婆死后，蔡大麻子仿照“乌龙院”扎了一座纸房，戏班子一套，鸡、鸭、鹅、狗、车马、箱柜和金童玉女……应有尽有。这些纸货整整烧了一个上午。还请了道士、和尚、戏班子，念经、奏乐、唱大戏，一连闹了三天，钱花了无其数。

四、应得的下场

解放前，蔡大麻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依仗日本鬼子，残酷地剥削贫苦的渔民，野蛮地镇压渔民的反抗。但是渔民们的反抗斗争，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渔霸强迫“实供”户打上来的鱼虾，必须全部卖给他，渔民就经常在出海时，把鱼虾偷偷地卖给外地鱼商。有些渔民由于不满渔霸的统治，不甘心给渔霸当牛做马，就偷偷地逃往外地。这些斗争，说明了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一九四六年，獐子岛解放了，岛上的渔民，在党的领导下，这才彻底

推翻了漁霸的反动統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从此，貧苦的漁民，做了島上的主人，永远摆脱了奴隶生活。

罪大恶极的蔡大麻子，被清算后便畏罪自杀了。他的兄弟蔡五蝎子，根据島上人民的要求，于一九五一年被人民政府依法枪决了。蔡大麻子的儿子蔡树仁，蔡大麻子的侄子蔡树恒和蔡树源也都根据他們的罪恶輕重和悔改情况，分別給以应得的处治。

現在，島上的全体漁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和教育下，組成了人民公社，充分地發揮了革命干劲，漁业連年增产，生活不断改善。可是漁民們並沒有忘記旧社会的悲惨情景和阶级仇恨。大家都知道，現在漁霸虽然早已被打倒了，但是他們的阴魂未散，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他們表示：一定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